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女遊史：臺灣女人的旅行再現、實踐與認同（1980-2000）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263-006-

執行期間：103年08月01日至10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計畫主持人：姜穎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邱韋樺

大專生-兼任助理人員：王韻婷

大專生-兼任助理人員：施沅君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

1.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2. 「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3. 「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否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5 日

中文摘要：「旅行」所帶來的（自日常生活）之抽離與破例，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性別意義。本研究乃是以休閒社會學的立場，透過深度訪談與論述分析，描寫臺灣女人和「出國旅行」交會的歷史脈絡，透過女旅人的生命經驗，揭露這個過程中的權力關係與歷史意義，建構一個性別觀點的1980、1990年代臺灣女人與旅行的論述圖像，具有多成的政治性與批判力道。臺灣自1978年（民國67年）12月30日起開放出國觀光。1980年代前臺灣人日常生活中的海外旅遊以「商務考察團」的名義進行。參與「商務考察團」的女性旅人多半是中產階級以上，家庭擁有經濟資本的中年女性，隨丈夫出國觀光。1980年代後，「名女人」的旅遊經驗成為臺灣女性旅遊經驗言說的重要對象。海外旅遊對於臺灣女性的「心靈成長」、「知性」與「國族主義」意義在大眾媒體再現過程中持續被生產與構連。在此同時，臺灣（海外）「自助旅行」風氣已然成形，女性作為自助旅行的主要行動者在1980年代初期已經確立，海外（自助）旅遊被視為女性衝破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賦權行動，但異國空間仍被再現為對女性充滿隱藏危機的公共空間，女旅人仍然是被凝視的客體，對女旅人身體與性的規訓透過個體自我監視來完成，成為女性海外旅遊的阻礙。邁入1990年代，女旅人媒體再現日趨多元，再現出知性、都會、高學歷、冒險犯難的女旅人形象。然而，傳統性別二元論述依舊存在，熱衷於旅遊的女性旅人，仍是「另類女人」與家庭、母職衝突。在臺灣女人的日常（海外）旅行的認同中，海外（自助）旅行已成為1990年代臺灣女性新的自我性別期待與規範，是中產階級女性重要的成就感符號。女旅人被一般女性視為重要的典範與啟示來源。旅遊言說與書寫在1990年代以前屬於少數女性作家、名女人的權利，1990年代開始，旅遊書寫變得普及為2000年代以後網際網路發展下的「眾聲喧嘩」奠基。

中文關鍵詞：性別與休閒、性別的空間、休閒社會學、旅行

英文摘要：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of the discourse of gender and tourism in Taiwan societ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From a perspective of leisure sociolog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link between gendered power and tourism by exploring the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travelers in mass media and tour guide books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female travelers. In the 1980s, female travelers in Taiwan used to be represented as passive tourists with fragile bodies. The space of travelling was taken as filled with risk and sexual temptation. Today, the discourse has changed. The space of tourism has been taken as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enjoyment and confidence for women. Women tell their own experiences of travel. Taiwanese women's discourses of travel have become a heteroglossia and a terrain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for themselves.

英文關鍵詞：gender and leisure, gendered space, leisure sociology, travel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

女遊史：臺灣女人的旅行再現、實踐與認同（1980-2000）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3— 2410—H—263—006—

執行期間：103年8月1日至104年7月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計畫主持人：姜穎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邱韋樺、王韻婷、施沅君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1 份：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期末報告處理方式：

1. 公開方式：

非列管計畫亦不具下列情形，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2. 「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否 是

3. 「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參考 否 是，_____（請列舉提供之單位；本部不經審議，依勾選逕予轉送）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0 月 31 日

目錄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壹、緒論與研究目的.....	1
貳、文獻探討：臺灣休閒/旅遊史中的女人論述.....	7
參、研究方法：建構在地、歷時的台灣海外旅遊性別論述.....	15
肆、踏上旅/女途：臺灣 1980、1990 年代的臺灣女性出國旅遊論述圖像.....	17
伍、結論：1980、1990 年代的臺灣女性與（海外）旅遊論述.....	40
陸、旅行＝解放？展望遊記、消費與敘事的 2000 年代.....	42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50

女遊史：臺灣女人的旅行再現、實踐與認同（1980-2000）

結案報告

摘要

「旅行」所帶來的（自日常生活）之抽離與破例，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性別意義。本研究乃是以休閒社會學的立場，透過深度訪談與論述分析，描寫臺灣女人和「出國旅行」交會的歷史脈絡，透過女旅人的生命經驗，揭露這個過程中的權力關係與歷史意義，建構一個性別觀點的 1980、1990 年代臺灣女人與旅行的論述圖像，具有多成的政治性與批判力道。臺灣自 1978 年（民國 67 年）12 月 30 日起開放出國觀光。1980 年代前臺灣人日常生活中的海外旅遊以「商務考察團」的名義進行。參與「商務考察團」的女性旅人多半是中產階級以上，家庭擁有經濟資本的中年女性，隨丈夫出國觀光。1980 年代後，「名女人」的旅遊經驗成為臺灣女性旅遊經驗言說的重要對象。海外旅遊對於臺灣女性的「心靈成長」、「知性」與「國族主義」意義在大眾媒體再現過程中持續被生產與構連。在此同時，臺灣（海外）「自助旅行」風氣已然成形，女性作為自助旅行的主要行動者在 1980 年代初期已經確立，海外（自助）旅遊被視為女性衝破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賦權行動，但異國空間仍被再現為對女性充滿隱藏危機的公共空間，女旅人仍然是被凝視的客體，對女旅人身體與性的規訓透過個體自我監視來完成，成為女性海外旅遊的阻礙。邁入 1990 年代，女旅人媒體再現日趨多元，再現出知性、都會、高學歷、冒險犯難的女旅人形象。然而，傳統性別二元論述依舊存在，熱衷於旅遊的女性旅人，仍是「另類女人」與家庭、母職衝突。在臺灣女人的日常（海外）旅行的認同中，海外（自助）旅行已成為 1990 年代臺灣女性新的自我性別期待與規範，是中產階級女性重要的成就感符號。女旅人被一般女性視為重要的典範與啟示來源。旅遊言說與書寫在 1990 年代以前屬於少數女性作家、名女人的權利，1990 年代開始，旅遊書寫變得普及為 2000 年代以後網際網路發展下的「眾聲喧嘩」奠基。

關鍵字：性別與休閒、性別的空間、休閒社會學、旅行

Taiwanese women and travel: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s, practices and identitie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of the discourse of gender and tourism in Taiwan societ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From a perspective of leisure sociolog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link between gendered power and tourism by exploring the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travelers in mass media and tour guide books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female travelers. In the 1980s, female travelers in Taiwan used to be represented as passive tourists with fragile bodies. The space of travelling was taken as filled with risk and sexual temptation. Today, the discourse has changed. The space of tourism has been taken as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enjoyment and confidence for women. Women tell their own experiences of travel. Taiwanese women's discourses of travel have become a heteroglossia and a terrain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for themselves.

Key words: gender and leisure, gendered space, leisure sociology, travel

壹、緒論與研究目的

從 19 世紀開始，科技發展逐漸將部分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休閒時間被創造出來，旅行作為一種休閒形式也得以開展。科技的發展同時賦予了人類跨越空間、時間「移動」的可能性。然而，這些在休閒中行動/移動者是誰？在父權制度之下，差異的性別角色建構、性別論述與公、私領域內所產製的傳統性別分工，男、女之間的休閒參與和休閒/旅行形式產生差異的發展，男性總是休閒的行動者與敘事者。Karla A. Henderson（劉耳、季斌、馬嵐，1996，頁 32）即認為，長久以來，女性在休閒研究中通常被忽略掉，「一部人類休閒史，僅是男性的休閒史」。

存在於休閒實踐中的性別差異，於 1980 年代尾聲出現了「休閒差距」論述，認為到家庭中傳統性別分工的影響，女性休閒參與仍存在著不平等（Hochschild & Machung, 1989）。然而，這種將休閒連結到女性自由與平等的象徵並非一蹴可及。Henderson（劉耳等，2000）認為，30 到 50 年代，女性的休閒多半以家為中心，是由她們的家庭與角色期待所決定。直到 60 年代民權運動、女性主義開展後，女性日常生活的政治性意義被強化，休閒作為一種賦權與自由的意義才得以成形。從 Cara Aitchison（1999）的研究可以發現，整個 1980 年代，西方學術界對於休閒與性別議題的著墨，均關注男女間休閒機會的不均等，旨在提升女性的休閒（運動）的參與，進而有許多「女人專門」（women only）的運動或休閒類型討論，多數研究著重非正式休閒、運動的討論，休閒地景（leisure landscapes）或旅行（tourism）等性別化的休閒空間討論尚未出現。直到 90 年代的新文化地理學（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的出現才得以發展。

在諸多的休閒實踐中，「旅行」所帶來的（自日常生活）之抽離與破例，被視為具有重要的性別意義。John Urry（1990；Jordan & Aitchison, 2008）認為，「旅行」的概念來自於日常生活（正常）和破例（非平常）二分法。談到假期（旅行），就假設個體的肉體和心靈都從家庭周遭環境和日常的社會規範中抽離（Andrews, 2005；Thomas, 2005；Jordan & Aitchison, 2008）。這也使得論述旅行在休閒場域中具有格外重要的性別意義。除此之外，「出國」旅行展現出更大的「跨界」意義，基於臺灣社會特殊的歷史脈絡，更具有重要的性別意涵。

綜觀前文，建構一個性別的、歷史的女性旅遊論述在當代休閒研究的場域中將具有重要的性別意涵。除此之外，對於繼受西方現代性的臺灣社會而言，建構一個「女遊歷史」也有著脈絡化的在地性意義。因此，本文亟欲探究的便是臺灣女人「出國旅遊」的歷史圖像，並揭示這個過程中的性別權力論述、實踐與認同。

檢視臺灣社會，基於特殊的歷史脈絡，1960 年 5 月起民營旅行社始核准成立，同年臺灣全省共有 8 家旅行社成立；1969 年 7 月 30 日則公布有「發展觀光條例」，但根據中華民國

國交通部觀光局的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歷年國人國內旅行按性別及年齡分」顯示（表一），直到1997年（民國86年），國人國內旅行按照性別分，仍是以男性的51%比女性的49%高；2002年（民國91年）女性（51%）首次微幅超越男性（51%），到了2012年（民國101年），女性的比率上升至51.9%。換言之，直至近15年，臺灣女人從事國內旅行的機會與資源才逐漸和男性均等。然而，若進一步檢視「國外旅遊」，臺灣從1978年12月30日開放出國觀光，依據「歷年國人出國按性別分析」（表二）1984年（民國73年）的國人出國人數約75萬404人次，其中男性比例超過5成；1990年（民國79年），國人出國的人次上升至294萬2316人次，男性仍佔超過半數（53.88%）；歷經下一個十年，2000年（民國89年）732萬8784人次的出國旅客中，男性的比例依然接近六成（58.07%）；依據2012年的統計資料，臺灣國人每年出國人次已經高達941萬5074人次，但男性（54.17%）的比例仍然超越女性（45.83%）。亦即在所需之經濟與社會資本遠高於國內旅行的國外旅行中，臺灣男性依然比臺灣女人擁有更大的「移動」可能性。

進一步分析，根據交通部觀光局2000年（民國89年）「國人出國旅遊消費及動向調查」，出國旅客的類型中，「已婚男性」佔35%，未婚的「單身男性」則佔了12%。女性旅客中「職業婦女」和「單身女性」各佔14%，「老人」則佔了11%，「家庭主婦」的比例最少，僅佔7%。而出國的動機中，「觀光旅行」的比例就佔了55%。這分資料反映出臺灣社會「出國」的主要行動者多半是男性（佔了46%以上），女性中則以受到家庭、經濟多重限制的家庭主婦，最為缺乏出國的社會資本。然而，若欲以此份統計資料理解臺灣兩性「觀光旅行」的差異仍有許多侷限性，例如，出國的旅客類型中雖有高達55%是為了「觀光旅行」，但在缺乏進一步的探究下，以「觀光旅行」為出國目的之旅人，其性別比例是難以確認的。另外，此種身份類型的區分，也將「老人」視為同質、無性別的一群，因而無法從此資料中理解臺灣社會高齡男性及女性差異的「出國」經驗。至於將「已婚女性」區分成「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但男性的受訪者卻僅有「已婚」和「單身」的差異，也是對於男女家庭內部性別分工的預期使然，「家庭主夫」的可能性被抹煞了。最後，依據觀光局「觀光市場調查摘要」所公布的資料，2001年起以「國人旅遊狀況調查」研究為主，在這樣的調查摘要中，旅客類型的性別差異在則未受重視。因此，僅憑藉著既有的官方量化統計資料甚難捕捉臺灣女人的出國/旅行經驗的。

年	性別		
	合計（百分比）	男（百分比）	女（百分比）
1997	100.0	51.0	49.0
2001	100.0	50.5	49.5
2002	100.0	49.0	51.0
2005	100.0	50.0	50.0
2010	100.0	49.1	50.9
2012	100.0	48.1	51.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表一：歷年國人國內旅行按性別分

單位：人次

年度	合計	男		女	
		人數	佔合計百分比	人數	佔合計百分比
1984	750,404	385,083	51.31	346,651	46.19
1989	2,107,813	1,116,469	52.96	945,403	44.85
1990	2,942,316	1,585,482	53.88	1,355,301	46.06
1994	4,744,434	2,670,349	56.28	2,074,085	43.72
2000	7,328,784	4,255,656	58.07	3,073,128	41.93
2005	8,208,125	4,761,492	58.01	3,446,633	41.99
2010	9,415,074	5,222,821	55.47	4,192,253	44.53
2012	10,239,760	5,547,161	54.17	4,693,599	45.8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表二：歷年國人出國按性別分析

除此之外，若檢視臺灣的相關統計，交通部觀光局的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中寫明「歷年統計資料最早可溯及民國四十五年開始」，但早期的統計對象主要是針對來台的華僑及外籍人士，因此「統計資料各項目的起始年度也不盡相同」。儘管臺灣自1978年（民國67年）12月30日起開放出國觀光，但臺灣人出國的「性別」相關統計直到1994年（民國83年）交通部觀光局才開始建置，換言之，臺灣女人的旅遊經驗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受到官方的重視。除此之外，量化數字或許能約略描繪出臺灣女人的旅遊經驗變遷圖像，但「女人的旅行，旅行的女人」在臺灣社會的不同階段是如何被詮釋、想像和期待的，反映何種性別意涵？此外，女性並非同質，不同時期、不同處境的臺灣女人有著何種旅行的經驗？這些問題必須透過歷時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才得以建構，這也是本研究所持之運動/休閒社會學立場的關懷與研究目的。下面的論述，將進一步釐清、探究臺灣的休閒/旅行歷史與性別論述，並導引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立論的理論基礎。

一、臺灣休閒社會的萌芽：旅行初體驗與「被觀光」臺灣女人

檢視「休閒」對於臺灣生成的社會與文化脈絡而言，無疑是近代工業化後的產物並且和西方的現代性息息相關（Tsai, 2006；蘇碩斌，2011）。Chiung-Tzu Tsai（2006）認為，基於儒家文化中「業精於勤荒於嬉」的傳統價值，「休閒」的概念在過去的臺灣社會中並不存在，而是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根據蘇碩斌（2011，頁622）的研究，華人的社會視「休閒」為一種生活型態，是中華民國創立後才出現的。民國初期萌芽的休閒，在仍受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土地上則有著不同的發展進程。臺灣社會的西方現代性繼受自日本（蔡禎雄，1995；陳柔縉，2005；陳芳明，2011；姜穎，2013），1920年代的臺灣社會已經以熟悉星期制（七天一週）的循環；1940年代前後，臺灣的都市每年已經有近90天的休假日，當時臺灣學校內部的體育活動、休學旅行、登山、鐵路旅遊、海水浴場等，為臺灣休閒社會埋下根基（蘇碩斌，2011）。同樣在這個時代，休閒/運動隨著女子學校教育/體育在這個階段進入了臺灣女人的生命（游鑑明，2000；2011；姜穎，2013），學生登山在1920年代不斷成為報紙

新聞（蘇碩斌，2011，頁 630）許多女學生參與了各種登山和修學旅行，在當時，登山甚至被認為是「新女性的行為」（林政君，2006，頁 289），是一種文明的體驗且十分時髦。然而，在當時能夠享受新式休閒生活的女性（女學生）仍是少數。相較於作為休閒/觀光/旅行的行動者，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女性，對於來自日本內地的觀光客而言，則是其觀光客凝視（tourist gaze）下的「她者」：

為了「被觀光」的早熟觀光事業：當時的旅遊雜誌，也多強調臺灣的異國情趣，主打椰子、木瓜、水牛等熱帶風土、中國婉約女性、山地奇俗生活等他族想像。（蘇碩斌，2011，頁 629）

臺灣女人的「被觀光」她者角色，在日本結束對臺灣的殖民後並未消失。1949年（民國 38年）臺灣社會內部的政治情勢劇烈轉變，1949年依據蔣介石的「鞏固臺灣」指示，臺灣省政府於2月10日公布〈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實施入境管制。5月19日，當時的臺灣省主席陳誠於5月19日頒佈了〈戒嚴令〉，5月28日再公布〈臺灣省出境軍公人員及旅客登記辦法〉並於6月1日實施出境管制，任何人想要出國都極為困難。因此，國人無法發展組織觀光的活動，這樣的管制一管就是二十多年。此外，整個1940年代臺灣的觀光政策，都必須以反共抗俄與勤儉建國為前提，排遣苦悶與玩樂則是次要的，因此延續了日本殖民時期的「被觀光形式」（蘇碩斌，2011）。因此，蘇碩斌（2011，頁 634）形容這個階段的臺灣觀光社會是「對外開放但對內禁錮」。儘管1953年（民國 42年）頒佈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揭示了臺灣社會基於工業化發展所出現休閒需求。但直到1965年（民國 54年）臺灣曾出現由官方印製精美宣傳手冊分送給在越南的美軍，成立招待中心招攬大兵來臺度假。1967年12月22日出刊的《時代雜誌》（Time）中之越戰士兵耶誕休假專題，臺灣的專頁是名21歲的美國海軍在北投由二名女郎陪浴的畫面。此外，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的「臺灣觀光大事紀」記載，1971年9月當時的臺灣觀光協會、亞太協會中華民國分會、中國電視公司及今日公司共同舉辦選拔，選出楊海蒂等五位第一屆的「中華民國觀光小姐」，隔年以「觀光使者」身份，分別赴美國、日本及東南亞各地訪問。1972年（民國 61年）臺灣省政府印發的《英文觀光指南》，則再次將前述的陪浴照片納為宣傳照（蘇碩斌，2011，頁 635-6）。

整體而言，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人作為受殖者自然難以享受出國/旅行作為觀光休閒的權力；日本殖民結束後，內外交迫的中華民國政權更無法給予當時多數的臺灣人自由出國的移動權力，然而，在這些歷史場景中，臺灣總是「被觀光」的休閒空間，而臺灣女人則無疑是這個空間裡被凝視、被觀光的「她者」。

二、臺灣女人的旅行、旅行的臺灣女人

今天臺灣最發達的出境觀光（outbound tour），直至民國 50年代仍尚未開放。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儘管政府尚未開放觀光護照，但已有許多民眾以洽公或商務的名義申請出國（蘇碩斌，2011）。1972年（民國 61年）9月，「入出境管理局」開始主管出國觀光發展的境管業務，但觀光護照仍尚未核發。直到1978年（民國 67年）12月，隨著經濟起

飛，政府放寬人民出國限制，始開放出國觀光。1979年（民國68年）1月，正式核發第一本「觀光護照」，臺灣的出國旅遊人口才開始逐年增加（陳室如，2002；何琬琦，2007）。

從此開始，出國旅行成為部分臺灣人休閒生活的一部份。戒嚴時期，就算能以考察、研習、留學或新聞採訪等名目為由提出申請，仍須克服各種繁雜手續與關卡，才能踏出國門。因此，「出國旅行」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乃是近30年餘內，隨著政治局勢與經濟狀態改變，逐漸形成的休閒概念。接著，隨著1998年1月開始隔週休二日；2001年1月進而全面實施週休二日，臺灣人的休閒時間擴大了，替「出國旅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如同前述，臺灣人並非均質的概念，臺灣女人雖然在1979年開始和她們的男性同胞同時獲得了出國旅行的法律上的權利。但是她們如何實踐出國旅行，出國旅行對這個階段的臺灣女人產生了何種性別意義與認同形式，另外，出國旅行和臺灣女人在這個歷史場景中如何被構連起來，反映出何種性別的意識型態，這些均是欲理解臺灣女人出國旅行的歷史與論述時不能被忽略的提問。

因此，若欲探究臺灣女性的出國旅行歷史，1980年代開始將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是理解「出國旅行」作為臺灣社會的新休閒形式時，女人是如何被再現、如何實踐的，而這樣的一個性別論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發生了何種變遷，才發展至今日的論述型態的重要歷史場景。整體而言，正因為「出國旅行」所需的各種形式之資本遠高於國內旅行或是日常生活閒暇的遊憩，以及那個有著地理上更為劇烈、更大的挪移與跨越，亦是彰顯休閒場域性別意涵之最適切的休閒方式。

近年來，臺灣女人的休閒/旅行經驗也的確在學術界成為不斷被言說的主題，以方法論的立場去區分時可以發現，仍以量化典範為主流。研究內容包含探究女性休閒特性、休閒類型與動機（張曉琪，2007；林瓊玉，2009；梁春月，2009；黃志暉，2008）；女性休閒參與的阻礙因素的分析（王天威，2004）。近年來，新移民女性的休閒（闕菊慧，2007）、未婚女性的旅行經驗也受到重視（薛茜蓉，2006；劉佩佩，1998）。其他也包含如更年期女性的身體狀態對休閒參與的影響（簡時福，2008）；或女性休閒服飾的研究（黃淑珍，2000）。此類研究多半將所蒐集的女性旅行經驗進行分類，然而，在未進一步進行脈絡化的訪談或經驗資料的蒐集時，容易同質化女性的休閒/旅行經驗，缺乏更細緻、更政治性的女性休閒/旅行圖像論述。

在此脈絡下，質性典範的女性休閒/旅行論述逐漸受到重視。程芬華（1999）的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勾勒離婚女性的休閒經驗；曾煥玫（1999）的研究則關注女性自助旅行者在自主旅行的過程中的實踐與詮釋；唐筱雯（2009）同樣分析女性自助旅行的經驗，視之為臺灣女人「性別逾越」的一種實踐方式。曾君佩（1998）的研究，則探索特定休閒空間「三溫暖」的性別與空間意涵；方淑儀（2005）、陳怡玲（2007）的研究則透過深度訪談，瞭解國小女性教師自助旅行與新移民女性休閒的生命經驗。周雅玲（1997）、蘇瑛敏（1998）則以空間為切入點，談女性旅行書寫與休閒空間的性別空間意義。林倬立（2004）的研究，則探討「當旅行成為工作」，也就是女領隊在旅行實踐中的空間流動經驗與轉變。

2000年，當時的《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54期出現了以「旅行與性別」的專題討論。楊芳枝（2000）在〈離「家」出「遊」：論旅行的性別政治〉中描述了臺灣社會對於男人與女人在大眾媒體中差異的再現方式，男人被再現為「旅人」女人則是「遊客」，反映出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林姬瑩（2000）則是記錄了自身以單車環遊世界的旅行經驗。此外，林佑甄（2000）〈文學以外的旅遊〉一文則強調學術界應跨/不分領域的關切有關「旅遊」的各面向議題。其中林佑甄（2000，頁8）「思索文學以外的旅遊」的提問，也反映出從2000年開始，臺灣學術界燃燒著一股女性旅遊文學的研究浪潮。女性在旅行中的認知、詮釋與言說，如何透過文本分析，彰顯出不同時期的性別與旅行意義，成為許多研究者關注的焦點（譚惠文，2007；黃恩慈，2006；許茹菁，2000；黃千芳，2003；李雅情，2008；王寬蓉，2006；何琬琦，2007；應蕙芬，2007）。多數研究結論指出，女性在旅行中壓抑、宰制與賦權並存，然而，旅行做為「出走」的象徵，仍然深具賦權可能性。從這個階段開始，國內性別休閒/旅行研究的視角出現了「言說轉向」的趨勢，亦即女性做為旅行中的主體，其詮釋與言說成為研究的核心，旅行者所處的脈絡也受到重視。

整體而言，若依據唐筱雯（2009）的分類，臺灣既有女性旅遊論述主要可分成四類，包含從休閒消費的角度，探討臺灣女性的旅遊動機與旅遊內容，其次是女遊書寫的文本分析，另外就是旅行產業中女性工作者（如領隊）的角色，最後則是女性自助旅行者的旅行經驗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數研究所關切、反映的都是研究寫成時（1990年代末期開始）臺灣社會各個當下的女性旅遊/休閒經驗，前文中所討論的1980年代作為「出國旅行」在臺灣社會茁壯新興年代的場景甚少被研究者關注；儘管女性旅遊文學的研究者可能從個別女性作家的言說中拼湊各時期女人與旅行的圖像，但1990年代末期以前（亦即2000年以前）的臺灣社會中「女人、旅行」的歷史質性，仍有待描繪與關注。如同林倬立（2004）認為，既有的研究限制仍然是缺乏「時間性」的討論。

這正是本研究之所以企圖透過帶有觀點的運動/休閒社會學立場去蒐集、分析史料，建構歷時性、性別化論述的初衷，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性與政治性之所在。整體而言，性別、旅行以及空間、身體，均僅應置放在更廣闊的社會脈絡中，透過不同時期重要的女性休閒/旅行的文化象徵（文本），將歷史圖像置入，描繪出更清晰的女性旅行論述的變遷。因此，本研究在歷史分期上將以（一）1980年代（二）1990年代為兩個時期，探究「出國旅行的女人、女人的出國旅行」在臺灣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是如何被相互構連的，產製出何種再現方式，還有臺灣女人如何實踐之、認同之，以及這些論述、實踐與認同的變遷圖像。研究者將在本研究中，分析臺灣社會在兩個階段中有關女性旅行的各種類型的文本與實踐方式，將鉅觀的社會結構與臺灣女人的旅行構連，並將論述與實踐形式的變遷勾勒出來，揭示性別權力在這段歷史場景中的行使與其意涵。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如下：

- （一）綜觀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臺灣社會，有關女人出國旅行的論述為何？論述如何生成？歷經了何種變遷？反映出的性別意涵為何？
- （二）此外，此時「女旅人的身體」在旅行空間中是如何被再現與期待的？而女性旅人由如

何詮釋、實踐與認同自身在旅行過程中的身體？其中反映出什麼性別意涵？

(三) 最後，在出國旅行的「空間」是如何在這兩個歷史分期的社會脈絡下被再現，其中意義的流轉與權力論述的轉變何在？

從研究問題中可以發現，在有關性別與旅行的論述中，那跨界的身體與挪移的空間正是彰顯箇中性別意涵的重要場域。然而，在性別化的空間討論中，女性的身體卻曾是失語的主體。研究者必須理解人們在休閒的脈絡中如何理解和經驗其身體，這個「具體化」

(embodiment)的過程過去鮮少被注意到(Cronan & Scott, 2008)。然而，從古至今，身體被用來當作一種政治性的宣示，一種表明壓迫和反抗的手段(黃宜萍, 2002)。若欲探究女人旅行的經驗，其身體經驗與自我認同，勢必蘊含深刻的性別意涵。從既有的文獻中可以發現，休閒/旅行的空間與身體的意義，乃是當代相關研究的重要主題，因此，本文將以兩者為文本分析的理論基礎。也是本研究計畫在文獻探討時的重要主題，進而導引出本研究的方法論思辯。

貳、文獻探討：臺灣休閒/旅遊史中的女人論述

一、女性主義與休閒/旅行研究

旅行作為休閒的一種形式，然而，何謂休閒？Rojek (2000)認為，每個社會裡都存在著剩餘的精力(energy)和未被使用的資源，「休閒」便是這種利用這些剩餘。在傳統的部落社會中，剩餘資源的使用總是和神秘祭儀和宗教儀式構連。Rojek更認為，古代的宗教儀式，便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的旅行和休閒，這是一個從儀式(ritual)文化發展為展演(performative)文化的過程。

對現代人而言，旅行和休閒是逃離日常生活的方式。休閒和旅行代表一種「逃離經驗」(escape experience)，其中具有「半宗教意涵」(semi-religious)，例如我們時常在旅行中使用「朝聖」(pilgrimages)這樣的字眼來描述旅程(Rojek, 2000)。對Rojek而言，「逃離」是旅行或休閒的關鍵意義。而這種傳統上屬儀式(ritual)的文化則轉變為具展演(performative)的性質，旅行/休閒成為一種展演的活動，有一套展演的劇本(scripts)。

Rojek視休閒/旅行為一種現代人使用社會中剩餘精力的形式。Henderson(劉耳等, 2000)的研究亦指出，儘管古代東方或古希臘哲學家都探討過休閒的概念。但休閒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是在當代才建立的。西方社會裡，整個1930到1940年代的地理學研究範疇中，關於休閒/旅行的研究多半是純粹關心土地使用或風景品質。儘管1960年代開始，E. P. Thompson、Lois Althusser、Raymond Williams、Stuart Hall和David Harvey等人開始關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區域發展和空間分配的問題，但休閒/旅行的研究仍受量化典範的主宰。直到1970、1980年代後受到後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批判實在論、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影響，才建立了新的傳統(Aitchison, 1999)。

探究休閒/旅行研究與女性主義的連結，則可以從休閒的定義談起。休閒的意義多重，

但主要由「自由時間」、「消遣活動」、「有意義的體驗」這三種因素的混融。其中「自由時間」便是工業化社會對休閒的定義。至於「體驗」則是避免了活動分類、工作時間和分工作時間的截然劃分。整體而言，自由選擇被視為休閒很重要的前提。自由，至少是某種形式的自由，是休閒體驗中最基本的要素（劉耳等，2000）。

檢視 1980 年代女性主義的基本信念「消滅女性所受的壓迫，不僅需要平等，還需要讓女性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及控制自己生活的權利」（Bunch, 1985；Henderson, 1996／劉耳等譯）。休閒/旅行概念中對於「自由」的強調，恰好與當時女性主義的意旨謀和。換言之，休閒的核心是自由與選擇（Carpenter, 1985），此外，自由與人格完善是女性主義的核心，因此，Henderson（劉耳等，2000）認為，自由在休閒和女性主義者兩個概念中都居於核心位置。

此外，承前所述，「旅行」假設個體的肉體和心靈都從家庭周遭環境和日常的社會規範中抽離（Andrews, 2005；Thomas, 2005；Jordan & Aitchison, 2008）。使得旅行的討論具有格外重要的性別意義。1980 年代，休閒與性別議題的論述主要關注男女間休閒機會的不均等，旨在提升女性的休閒（運動）的參與。「旅行」作為重要的性別與休閒議題，直到 1990 年代新文化地理學論述出現後才得以開展。

二、休閒的空間與性別：新文化地理學

什麼是休閒？個體參與的休閒活動類型，其活動的物質環境與社會背景結合，構成了一個空間。這個人在此空間中，將自己所處的情境定義為休閒體驗（Shaw, 1985；Henderson；1996／劉耳等譯）即是。換言之，空間對於個體形成「休閒」的體驗甚為重要，然而，在過去，空間、性別、性鮮少與休閒地理學構連，直到地理學開始關注空間化的女性主義（spatialized feminism）和性別的空間（gendered space）後，才逐漸轉向至休閒研究的領域。近年來，研究休閒、旅行的研究者開始承認性別關係、空間關係和休閒之間的重要連結。於是 1980、1990 年代「新文化地理學」興起，空間的研究範疇中納入休閒、文化和旅行。新文化地理學的理论觀點，乃是在於分析性別的社會建構、休閒和空間，透過空間化女性主義和性別空間的討論，構連性別研究、休閒研究和地理學（Aitchison, 1999）。

Aitchison（2003）整理了西方社會性別休閒研究的發展歷程。從早期的多元論和新馬克思主義之爭，英國的休閒研究在 1980 年代起受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影響，傾向結構主義式的討論。其後，隨著後結構主義關注性別與休閒議題，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也由物質結構轉移到文化關係上。孕育出新文化地理學的視角。Aitchison 認為，新文化地理學在當代理論觀點中較能覺察出休閒地理的多樣性和流動性。地景（landscape）和性（sexuality）是新文化地理學在休閒地理中所關注的面向。新文化地理學的討論，乃是藉著概念化性別的空間和性的空間化（spatialized sexuality）來進行。對其而言，休閒/旅行的空間、地景、地方並非處於固定的狀態，而持續不斷地進行權力、抗爭的協商鬥爭。由此可見，新文化地理學重視「能動」更甚於「結構」。更甚者，新文化地理學關注空間的複雜性，拒絕空間決定論和過去結構主義的宏大敘事。在休閒/旅行的研究場域中，融合社會學和文化研究，關切休閒和

旅行中的行為、意義、消費和認同 (Aitchison, 1999)。

在此脈絡下，David Crouch (2000) 提出「非再現地理學」(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y) 概念。對「非再現地理學」而言，「脈絡」至關緊要，研究者應探究個體的不同處境，如何在各自實踐中協商出差異、脈絡化的意涵。依據其觀點，在休閒/旅行的場域中：「空間」乃是一個背景、一個脈絡或是休閒/旅行被給予的客觀組成成分。「地方」則是一個物質意向，提供一種隱喻，化身為廣告手冊中內容，如地景就是一種提供人們想像之物。對「非再現地理學」而言，空間僅是客觀的、脈絡化和隱喻的；地方才是流行文化運作、再運作和協商之處。生活在地方發生，認同和迷思的建構也在這裡。非再現地理學透過「非再現理論」的分析，揭示個體的行動和實踐，並將之與空間構連 (Crouch, 2000)。

更進一步分析，Crouch (2000) 相信，個人不是完全自由也非全然被動。當一個人在從事旅行/休閒時，他們會發現自身處於一個地方。這地方自有其氛圍，個人在其中感受和行動。旅行/休閒乃是創造知識 (making knowledge) 的方法，個體透過旅行/休閒以一種新的、複雜的方式瞭解這個世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地方的運作、再運作、理解和再理解，也就是人和脈絡間的協商、對話，乃是一種「平民地理學」(lay geography)，旅行/休閒則為此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休閒/旅行乃一個過程，永遠在創造之中。此外，對於「非再現地理學」而言，實踐、空間、主體、知識和具體化 (身體) 均是重要的概念。人們透過相遇的空間來定義友誼和認同。這樣的友誼和認同，乃是透過和空間相關連的行動所開展。因此，實踐、空間、主體和知識如何透過具體化的方式產生，身體的實踐與意義為何，也應是關注的焦點。

在休閒/旅行的討論裡，「空間」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休閒雖然在任何一種空間中都可以發生，但有些空間容易產生休閒體驗，另一些則可能限制休閒。個體的處境 (階級、種族、年齡或性別) 也會影響他擁有什麼樣的空間來承載休閒體驗。在多數社會，並不是每個人都平等地擁有促進休閒的空間 (劉耳等, 2000)。此外，如同 Pierre Bourdieu 的觀點，地方，和在每個地方中被視為適當的實踐，均是性別、階級等建構和脈絡下的產物 (Bourdieu, 1984; Crouch, 2000)。意欲探究休閒/旅行的空間，空間再現的差異與文化意涵就具有討論的必要性。

三、危險的公共空間

社會對於女性休閒的控制，往往就是女性近用公共地方 (public spaces) 所受到的規範，這也包含了她們在公共地方的行動。(Green, Hebborn & Woodward, 1990; Aitchison, 1999)。

公共空間作為性別、階級等建構和脈絡下的產物，處在不同社會處境的個體，對於公共空間的近用存在著差異和不平等。若我們僅將女性參與休閒的歷史，看成一個與男性競逐公共空間的過程，將會忽略權力運作的多樣性。在父權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將公共空間再現成

隱藏危險的，「好女孩」應該遠離部分公共空間。但這樣的規訓論述，往往是透過自我監視的過程遂行的。

從年輕時代起，女孩總將「外在」(outside) 公共空間描繪成隱藏著危險，「內在」的私人空間則較為安全。這解釋了女性為何多半選擇室內空間進行休閒。女孩們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深恐外出就會發生危險，特別是夜晚。此外，這種恐懼更和「危險的男人」連結。女性不斷反應對於綁架、強暴、搶劫、謀殺的恐懼。在他們的研究中，暗巷、樹叢、廢棄的房子都被認為可能隱藏著危險 (Green & Seabrook, 2004)。Green 與 Seabrook (2004) 的研究場域乃是女孩們家庭周遭的街區，儘管是每日的生活空間，女孩仍對其存在著深切的恐懼。這也符合多數社會中女孩的處境。「旅行」相對於日常生活的行動，移動的距離更大了，公共空間的內涵更加複雜。除了隱藏危險、象徵恐懼，空間的意義，是否更複雜、多樣？在性別與休閒/旅行的討論中，值得關注。

四、旅行作為一種異質空間

談到休閒/旅行中的不平等，Rosemary Deem (1982) 認為，女性在近用休閒空間和活動上常經驗到不平等。在休閒場域中，女性常受到壓迫或被視為次等的參與者。因此，Deem 認為，運動和休閒都具有一種雙元的特性。除了能提供一種真正的愉悅感外，休閒往往也掩飾了某種形式的社會控制和商業化。

同樣探究休閒空間的雙重性，亦即休閒空間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強化男性宰制的場域，同時也是女性為自身嘗試不同主體性的空間 (Wearing, 1998; Cronan & Scott, 2008)。因此，Wearing (1998) 與 Fullagar (2002) 均挪用了 Foucault 「異質空間」的概念。強調休閒和旅行提供了一個異質空間，性別劇本和敘事在其中均可以被重寫。旅行乃是一種特殊的異質空間，處在離開、移動和歸返之間。換言之，休閒活動可以用來肯定其它社會體制所確定的文化範式，但同樣也可以用來為和既有文化範式相悖的價值與行為的表達提供一個舞台 (Peiss, 1986)。

Simone Fullagar (2002) 認為，穿梭在家庭和出走、熟悉和不確定之間，旅行充滿了多種慾望的刺激，產製出多種對自我和他者的瞭解。然而，如同 Homi Bhabha (1991) 的觀點，認同永遠是矛盾的，認同的機制永遠不是純粹和單一的，永遠都處在一個替換、移位和投射的過程中。旅行空間的流動性和多樣性，以及其作為一種異質空間可能的賦權能动性，使得旅行、旅行中的女人、女體與認同成為深具性別意涵的論述焦點。

五、脈絡化的空間討論

根據 Aitchison (1999) 的分析，Linda McDowell (1993) 等人的研究是地理學研究關注性別議題的濫觴，關注性別和都市空間，或第三世界發展的性別議題。這種研究取向，逐漸形成了「空間化的女性主義」討論。將女性主義的分析指涉至空間層面的性別權力關係討論。空間面向的事物，被視為基於社會、經濟和環境目的而對於空間、地方和地景的使用、

控制、權力與支配。發展至 1980 年代女性主義地理學從關注空間模式和空間關係中的性別差異，轉而專注識別和解釋性別和空間關係的社會、象徵建構，亦即性別的空間性。

(Aitchison, 1999)。後現代的女性主義也開始質疑大敘事立場的女性主義，轉而關注女性主義地理學研究中的性別差異和多樣性。

昔日旅行研究鮮少將女性視為單一的市場，研究旅行類型也鮮少區分男女性的差異 (Cohen, 1979; Aitchison, 1999)。多數的旅行研究都是強調女性沒有如同男性的旅行機會。直到 Swain 在 1995 年的研究，認為旅行的性別研究應該關注旅行活動的實踐、消費和意象中的性別關係，不僅和就業（同工不同酬、低薪、兼差等）層面構連。

承上所述，脈絡化的空間論述乃是當今女性主義地理學、性別休閒/旅行研究的關注焦點。有關旅行、旅行空間的論述，包含複雜的性別差異和多樣性。然而，除了空間的討論之外，女性的身體作為旅行的行動主體，也在休閒/旅行的討論中和空間構連起來。如同 Crouch (2000) 的觀點，在思考休閒/旅行時，地方 (place) 具有永恆的重要性。休閒/旅行中會和不同的人、不同物質空間相會 (encounter)，對於休閒、地方、自然與都市的有著差異的想像、意念。Crouch 以「非再現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強調日常生活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日常的活動和實踐建構出意義和價值體系，「主體」的位置非常重要。這喚醒了對於「身體」的關注，身體被視為行動的主體，而非實踐或政策的客體。這使得地理學研究開始關注人的活動。

六、「具體化」：身體的重要性

若要定義具體化 (embodiment)？「具體化」乃是一個經驗、創造意義、理解的過程，透過一個感官人類主體的實踐。首先，主體理解世界透過多重感官；身體被空間包圍，並且多面向的與之相會；最後，透過身體，個體在地方中表達自我，並且改變地方的意義。簡言之，當個體參與、相遇和理解世界便是透過一個具體化的過程。將研究焦點聚集在身體，乃是將之視為一個客體、一個認同、一個生活風格的成載者並且受到壓迫。若置放在休閒/旅行的場域中，身體是文化再現的焦點，得以形塑休閒的意義。例如休閒商品利用身體來推銷，透過身體的裝飾完成文化資本的形塑 (Crouch, 2000)。

當代研究重視身體，乃是對於笛卡兒以降身心二元論的反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身體的討論未必關切性別議題。甚至有可能是性別盲的 (Cronan & Scott, 2008)。因此，女性主義的身體研究應提供不同女人、不同身體的經驗。

在諸多對於身體規訓的討論中，Michel Foucault 的權力論述影響後來的性別研究者甚鉅。Foucault 認為，「規訓」是社會中諸多權力運作的目的。無論在任何機構或空間中運作，「規訓」均追求一個可被限制、轉化與改進的馴良身體 (劉北成、楊遠嬰, 1999)。因此，研究身體必然涉及社會控制。任何對於社會控制的論述，必然涉及父權制度對於女性身體的掌控。Iris Marion Young (2005) 認為，女性和男性的身體反映出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以及被預期之性別化的行為。

然而，對於身體的規訓與權力運作絕非單向。換言之，儘管所有社會都存在著對身體的治理，但抵抗和反對永遠也會存在（Cronan & Scott, 2008）。若置放在休閒/旅行的研究領域上，女性主義者擴充了 Foucault 的觀點，關注性別化的身體觀、認同，甚至是休閒。對於某些女人而言，休閒提供了對抗的道路。傳統被動、屈從的女性刻板印象受到衝撞（Wearing, 1998；Cronan & Scott, 2008）。在旅行/休閒的歷史裡，女人和女體絕非靜靜地、被動地受到壓迫和宰制。

在休閒的場域中，地方被再現為身體放鬆、活躍的之處，代表了愉悅（Crouch, 2000）。當女人在休閒/旅行的能動性被正視，休閒便有可能成為，針對主流社會典範有意圖或非意圖反抗的發生地。社會中被壓迫的群體，透過某些休閒的形式去衝撞社會規範。休閒作為一種反抗的形式，除具有賦權能力外，也能帶動集體的社會變革（Cronan & Scott, 200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對與休閒場域中女體的能動性與反抗的重視，絕不能流於過度樂觀，導致忽略了規訓與宰制的力量。

七、風險與流動的女體

女人為何在休閒的場域受到限制與壓迫？Deem（1982）整理出數點原因：包含無給職的家務勞動、母職、兩性關係、女性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位置、性別化的教育、男性氣概與女性特質的文化再現，均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侷限女性休閒的可能。最後，Deem 認為，「性」（sexuality）扮演了重要角色，女人的性被控制。恐懼也被製造出來，女人面對獨自旅行甚至行走，都存在對於性攻擊的恐懼。承前所述，無論是性別化的社會化過程、女性氣質的期待與想像，以及對性的控制，均共同再現出一個女體的論述，並產製出一套相應的規訓論述。

首先，公共衛生的論述總是將女人的身體描繪成危險的。因為女人的身體若和他人親密互動，若非是具有性引誘力的，就象徵了哺乳者（Bunton, Crawshaw & Green, 2004）。Elizabeth Grosz（1994）亦指出，女人的身體被認為高度具有風險和具傳染性，因為女人的身體為釋放出液體，被視為威脅或是骯髒。體液象徵了女人身體的可穿透性，象徵女人脆弱容易受傷害且必須依靠外在世界。女人的身體同時是脆弱和具有引誘性的。因此，當男人的身體被建構（再現）為強硬、堅毅、乾、受到控制和強壯時。相反的，容易滲漏、黏呼呼、流動和脆弱的則是女人的身體（Bunton et al, 2004）。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性化的身體被凝視，亦即男人和女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依據男性氣概和女性特質，馴服成柔順的身體（Jordan & Aitchison, 2008）。

將之置放到休閒/旅行的場域中，力量（strength）和強健（toughness）是運動的特質，但並非女性的價值（Wearing, 1998；Cronan & Scott, 2008）。此外，旅行，長期以來在父權的觀念中總和冒險、愉悅、異國情調相關，充滿了男性氣概的意念（Enloe, 1989；Pritchard, 2001）。因此，無論運動或休閒/旅行場域的身體論述，往往存在著一套對於西方、異性戀、男性身體的想像，女體被邊緣化，被視為「不適合」、「不方便」參與其中。女人的身體則置

放在「適合」的運動、休閒/旅行空間內，然而這些空間往往與公共空間隔離，或以性別化的方式再現。Gary Cross (1990) 研究西方社會的休閒文化歷史，發現自維多利亞時代開始，已婚女性就是家庭休閒娛樂的組織者(規劃者)。在當時美國觀念中，女性是天生被設定於一個安詳、和平和休閒的狀態。如果男人的職責是主外，女人則應隱居在家。男人要將權力展現於大眾前。換言之，「男主外、女主內」乃是西方傳統休閒/旅行的論述，女性的休閒/旅行往往和家庭連結。此外，承前所述，常規的女性特質是由異性戀所定義的，如果否認這種特質，將會對兩性間界線和秩序構成侵犯。(劉耳等，1996)，對於同性戀的「恐同」情結也會產生。最後，對於身體的性別化規訓與想像，透過一連串的監視與自我監視來完成。

八、凝視與風險

1990年代開始，風險社會研究興起，監視(surveillance)成為關注的議題。Jordan 與 Aitchison (2008) 的研究便關注「監視」和「具體化」的連結。認為兩者均具有性別化、性化和種族化的特質。在旅行過程中，旅行者和東道主的認同與相互關係，均涉及了性別、性和種族的構連關係。因此，他們特別關注旅行中的「凝視」(gaze)。依據 Manuel Castells (1996; Jordan & Aitchison, 2008)「流動社會」的觀點。隱私不再僅是針對固定的空間，隱私和檢視早已是流動的概念。Jordan 與 Aitchison 認為，監視不僅是電子技術發展下的監視設備，肉眼也造成監視的具體化(肉體化)。在旅行的研究領域，也產生了身體的轉向(embodied turn)。

Jordan 與 Aitchison (2008) 發現，西方的旅行論述總將女性再現為性凝視的客體，並將旅行和性、享樂主義自然劃上等號。單獨旅行的女性，往往會意識到被凝視。而這種凝視往往是性別化的，單獨旅行的女人甚至被認為性態度是隨便的。這造成了旅行空間的性別化、性化和具體化。此外，休閒/旅行中的視覺經驗，再次確認了身體做為男性敘事的客體(Urry, 1990; Crouch, 2000)。

然而，這種凝視並非單一和固定的。「相互的凝視」也可能發生，衝擊既存的權力關係。因此，研究者認為，應進一步關注旅行中的凝視內蘊的性別與權力關係。「凝視」可以被扭轉，被凝視的個體也會舉有能動性，得以翻轉其中的性別規訓(Jordan & Aitchison, 2008)。最後，旅行中的「凝視」往往和前文中所談的「風險」(恐懼)連結。Bunton 等人(2004)的研究曾經發現，當遇到教育、家庭和同儕關係等複雜的社會文化影響時，風險，很有可能是可以協商的概念。也就是說，年輕人的風險論述具有身體的反身性(embodied reflexivity)，面對風險時差異的位置可能在性別化身體的建構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換言之，女體在休閒/旅行的空間中如何凝視、被凝視以及詮釋凝視，將具有重要的反身性與性別政治性意義。在休閒中脈絡，女性的身體是權力和從宰制論述中獲得自由的源頭(Cronan & Scott, 2008)。

九、旅行女人的再現與認同

Pritchard (2001) 的觀點，無論是旅行者、旅行中的東道主、旅行行銷和旅行本身均是

性別化的產物，反映了男性的觀點。這種情形特別反映在旅行代表的意向 (image) 和行銷上。Pritchard 曾研究推銷旅行的廣告手冊，認為其中的符號、迷思和幻想都不可避免地帶著男性視角，且必然是異性戀的。在廣告中，女性全面地被設定成附屬的角色，複製性別的刻板印象。商業廣告至今依舊強化女人的性魅力或精於家事，男性也多半被設定在傳統的角色上。

然而，Pritchard (2001) 也非全然悲觀，他認為，或許在多元主義之下，新的媒體論述可以構連出不同於異性戀父權制度的旅遊論述。如同 Aitchison (2004) 強調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個體被視為是進行創造性消費的消費者，不斷再製文化，絕非文化傻瓜。藉此，Aitchison 認為，可將休閒視為一個不斷變化的地景，存在著針對主流論述的抵抗、辯論、斷裂與轉變，以及異質的社會、文化和休閒關係。女性休閒/旅行的空間、身體論述，均存在扭轉主流價值與宰制的能動性。

在當代文化中，休閒對於建構和形塑認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休閒不僅是工作的附屬品，休閒本身就是衝突和挑戰的場域 (Wynne, 1998)。在此脈絡下，近年來，旅行研究興起了對於旅行經驗的書寫、再現，關注旅行的論述、敘事和隱喻。法國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書寫自身得以彰顯欲望和女性主體。書寫和旅行均提供了破碎的可能性，可能衝擊既有的性別論述 (Fullagar, 2002)。這恰好也是國內女性旅行研究的趨勢，在旅行的書寫中，女性經驗被言說，新的認同與旅行論述也被產製出來。Aitchison (2004) 整理女性休閒研究發展歷程。她發現，受後結構觀點的影響，休閒、文化、運動和旅行已經成為認同建構、爭論、協商和風險的核心。當今女性在描述休閒的時候時常會提到，是休閒增強她們的自信，讓她們覺得自己有能力。這是因為休閒使女性能衝破嚴格的性別角色規範 (劉耳等, 1996)。

最後，Deem (1996) 認為，近來休閒和旅行的「後現代分析」仍舊延續了白人、異性戀男性的觀點。必須更深入的理解特定空間的本質以及其中複雜的性別和階級關係，才能獲致女性休閒的完整圖像。女性休閒不能被視為同質的經驗整體或範疇。也不能重陷「性別盲」的困境，忽略差異和權力不平等。換言之，當處理女性的壓迫和抗拒的時候。所有「共享的壓迫」或「共享的反抗」都應被視為複雜的。女性擁有多元的認同，儘管有時享有相似的經驗或群體的認同，但在特定的歷史、處境脈絡下會發展出非常個人的認同與對應方式，建立自身的主體 (Scraton & Watson, 1998)。

因此，臺灣社會在繼受西方現代性的同時，原有的文化價值體系在西方現代性的衝擊下，產生了抵抗、折衷、順服等多重的繼受方式。揭示臺灣社會女性旅遊的歷史，便是企圖在特定的脈絡中，探究「旅行」作為女性休閒時所勾勒出的特殊、在地的性別意涵。Chiung-Tzu Tsai (2006) 曾論述「儒家文化對於臺灣女性休閒的影響」即是試圖去探索臺灣社會文化底蘊與西方現代休閒觀念相遇時，對於臺灣女人休閒經驗的意義。她認為，基於「業精於勤，荒於嬉」的傳統儒家哲學，休閒對臺灣社會而言是繼受自西方現代性社會的概念，並非原生，臺灣女人儘管隨著工業化進程，在這 30 餘年中有機會得到經濟的獨立。但在休閒場域，她們仍未獲得平等的地位，原因在於儒家的傳統哲學依然發揮著影響力。然

而，臺灣基於一個多重殖民的歷史、社會構造，「儒家文化」是否足以解釋臺灣女人在休閒場域中的困境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儘管如此，Tsai 的研究依然揭示了建立脈絡性研究的重要性，但唯有歷時地，將鉅觀的社會結構與臺灣女人的旅行鑲嵌，才能反映出休閒與性別場域的歷史質性及其變遷。這對於理解臺灣女人的休閒/旅行經驗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

參、研究方法：建構在地、歷時的台灣海外旅遊性別論述

本研究將採質性典範，透過社會學的視角，探究 1980 年代及 1990 年臺灣女人旅行論述的動態圖像。社會學的視角乃是強調以社會的各種傳統及社會體制為分析的基礎。這種分析方法有助理解與休閒/旅行場域的性別權力關係，探究其文化意義，以及限制女性的結構性因素 (Green et al., 1990)。這個研究必然是歷史的重新言說，Henderson (劉耳等, 1996) 曾提及「一部休閒史是男性休閒史」。儘管女性向來就有自己的工作，她們也向來就有自己的休閒。然而，在歷史上，工作與休閒對男性與女性並非以同樣的方式體現。然而，西方女性休閒的歷史時常遭到掩蓋。因此，Henderson 認為，必須讓「很多不同的女性」在歷史中「同時說話」。因為不同的女性、她們不同的經歷以及她們活動的背景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其他眾多的事件與人物聯繫在一起。歷史學家研究的往往只是一種「對話」，所以史學家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對話放回到多種話語並存的背景中 (劉耳等, 1996)。換言之，女性的旅行/休閒的論述或經驗，不應自社會脈絡中抽離，必須置放在歷史的社會結構中檢視，才得以詮釋。因此，本研究將透過歷史的分期，分別論述不同社會結構下的臺灣女人旅行的論述與經驗，探究她們的身體詮釋、實踐與認同以及性別化的空間想像在旅行場域中交織出的意義。

質性研究重視多元、彈性，富創造性，並關注研究現象 (對象) 的多樣性，反映出一種強調社會脈絡的批判主義精神。研究對象的生活、主觀經驗、主觀經驗之社會反映均是質性研究關懷的重點，契合了性別研究中，對於被研究者日常生活關注的許諾 (胡幼慧, 1996, 頁 3)。對於多元性的重視也反映於研究方法的選擇和使用上，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包含了歷史資料蒐集、深度訪談及論述分析，隨著研究的不同狀態和階段適時置換。以下為本研究採用之三種研究方法：

一、歷史資料蒐集

本研究第一個階段的研究工作是透過多元歷史資料的蒐集，回溯歷史，建立一個脈絡化、在地化討論的基礎。如同英國運動社會學者 Alan Bairner (2012) 及臺灣運動社會學者陳子軒 (2013) 近期都提出「建構社會/」集體記憶」的方法論創新 (methodologically innovative)。置放在本研究的脈絡中，就是關注臺灣社會中休閒/旅行的空間和有關女人出國旅行的「記憶社會學」(sociology of memory)。所謂社會/集體記憶，乃是和特定歷史、地理脈絡的情感與意識型態連結 (Johnson, 2004)。Bairner 認為，對於「集體記憶」的重視與關切，不僅是一個方法論上的行動，更是一個看待歷史的知識論問題。換言之，當我們看待臺灣女人的旅遊歷史時，關注的範疇必須擴大，包含女旅人的自傳甚至虛構、半虛構的文本以及建構那個被「永懷」(monumentalize) 的有關 (女人) 出國旅行的集體記憶。不僅那些被

「寫定」的官方歷史具有意義，新聞、女旅人、大眾文本的閱聽人的記憶、陳述與書寫都具有意義。

因此，本研究首個研究進程便是整理 1980-2000 年代間，有關「出國旅行」的各種類型文本。平面新聞文本部分，本研究蒐集之文本包含 1978 年至 2001 年期間《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以及 1978 年 2 月 18 日創刊的《民生報》，其被視為臺灣最早的「吃喝玩樂報」。透過文本論述建構出國旅行在臺灣開始發展的第一個歷史階段的性別言說與意涵。電子媒體部分，則是透過 1962 年 10 月 10 日起創刊的臺視《電視周刊》以及 1979 年 12 月 30 日起更名的《中視周刊》等電視台官方刊物，去尋覓出國旅行在 1980 至 2000 年的臺灣社會是如何被再現、被想像，女人在這段歷史中如何和出國旅行構連，她們有著何種實踐與認同方式。此外，隨著開放出國旅行，各種旅遊刊物、指南在這個階段如雨後春筍般出版，亦是本研究文本蒐集的來源，耙梳這類旅遊刊物的論述，對於理解 1980 至 2000 年間臺灣社會對於「出國旅行」以及「女人、旅行」的集體記憶與詮釋至關緊要。

二、深度訪談

本研究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在前述的「集體記憶」圖像被建構完成後，在這段歷史中，找出那些重要的言說、實踐出國旅行的女人們，從其生命經驗，描繪這兩個歷史階段女旅人的生命經驗與認同，藉以完整整個臺灣女人旅遊歷史的書寫。在深度訪談的過程中，我們思考有關認同的問題。認同並非原本「就在那裡」，而總是必須被建構。更甚者，認同事實上只能被理解為過程，理解為存有 (being) 或是流變 (becoming) (王志弘、許妍飛，2006，頁 5)。書寫認同乃是高度政治性的行動，揭示了權力運作的斧鑿，而認同的書寫必須回溯。這些女人的生命經驗，這些「過往」是重要的資源。對她們個人而言，過往是記憶，就集體而論，那就是歷史。因此，她們的旅行經驗與認同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透過歷史脈絡的鋪陳，找出結構性的社會力量，並且透過多重且彈性研究方法去交織臺灣女人的旅行經驗、記憶來刻畫認同的個人面向。揭露權力在這個認同形塑中的運作和遭遇的抵抗與妥協，將是本研究的重要工作。

因此，在這個階段的研究工作中，本研究將透過那些重要的女性旅遊言說者或女旅人的生命經驗來勾勒臺灣女人的旅行詮釋、實踐與認同。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包含，1980 年代起即從事旅遊業的業者；1980 年代臺灣早期重要的女性自助旅行作者以及 1990 年 10 月 7 日到 2002 年 8 月 30 日共播出 502 集的旅遊節目《繞著地球跑》，節目主持人李秀媛及外景主持人曲艾玲。李秀媛更在 1995 年將節目中的旅行經驗寫成《繞著地球跑：李秀媛冒險書》一書，這些女人的生命經驗均是本研究建構論述的重要基礎。本研究透過這些女性旅人的深度訪談，勾勒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臺灣社會中「女人、旅行」的集體記憶與生命故事，探究性別意涵的流轉。

三、論述分析

整體而言，透過前述兩種方法完成 1980 至 2000 年臺灣女人與出國旅行的史料蒐集後，第三階段的研究工作則是透過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晶析出建構這些文本的歷史與

社會脈絡。檢視在這段「集體記憶」中運作的權力關係與性別意涵。換言之，「論述分析」使研究者得以跳脫表面價值（face value）的限制，把臺灣社會的政經脈絡鑲嵌到這個歷史場景中臺灣女人的旅遊論述與實踐之中，言說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氛圍，描繪出權力運作的軌跡與那些可能的宰制、壓迫與賦權。亦即林宇玲（2007）所謂以豐富資料和批判分析去掌握個人與結構間的關係；重點在於深入現象核心，解釋許多其他情境及案例的現象，讀者可以以自身經驗加以同理化（emphathize），儘管它未必符合統計學上的概化觀念（Smith & Caddick, 2012；陳子軒，2013）。整體而言，本研究將透過三個層次的研究方法實踐，以休閒社會學的立場，描寫臺灣女人和「出國旅行」交會的歷史脈絡，透過女旅人的生命經驗，揭露這個過程中的權力關係與歷史意義，建構一個性別觀點的臺灣女人與旅行的論述，此論述具有多成的政治性與批判力道。

肆、踏上旅/女途：臺灣 1980、1990 年代的臺灣女性出國旅遊論述圖像

一、臺灣人出國旅遊的濫觴：商務考察團

「出國旅行」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乃是近 30 年內，隨著政治局勢與經濟狀態的改變，逐漸形成的休閒概念。台灣從 1945 年 5 月 20 日頒佈「戒嚴法」進入半鎖國狀態，「出國」一事，在當時僅能以考察、研習、留學、新聞採訪等名目為由，方能踏出國門。直到 1978 年 12 月，隨著經濟起飛，政府放寬人民出國限制。1979 年 1 月，正式核發第一本「觀光護照」，出國旅遊的人口才開始逐年增加（陳室如，2002；何琬琦，2007）。

透過訪談可以發現，儘管 1979 年 1 月第一本「觀光」護照才予以核發，但臺灣人在 1970 年代末期已經存在「熱中出國旅行」的休閒意識。「以商務考察團名義行觀光之實」則是當時出入境限制下的產物。

在 1979 年民國 68 年以前，如果你要出國的話，就只有一個管道叫「商務考察」。第一個你要是這個公司的員工，那公司要開一個在職證明給你，有在職證明以後你才有辦法去，我們現在的移民署以前叫做出入境管理局去辦護照。護照辦下來以後，看你要到哪一個國家，再去辦簽證。辦簽證完以後，你就可以用出國考察的名義出國。（蔡進祥訪談，2015 年 5 月 20 日，新北市）

一般我們出去不能叫旅行團，因為你拿的護照是商務考察的護照，那時候沒有觀光護照。出國的目的是商務考察，以商務考察的名義出國，不能用觀光兩個字，但是實際上是出去玩。（蔡進祥訪談，2015 年 5 月 20 日，新北市）

東南亞商務考察，其實大家都知道，政府也知道.....台灣以前早期就是東南亞考察團、歐洲考察團、韓日考察團、商務考察，因為沒有觀光，就用商務考察，大家都知道那個就是做觀光的。（蔡進祥訪談，2015 年 5 月 20 日，新北市）

「以商務考察之名行觀光之實」的出國旅遊模式下，已經有許多臺灣人踏出國門進行觀

光旅遊。當時旅遊業者亦以「商務考察團」為「廣告」內容。

出國考察，就是一個在職證明，在職證明要附上公司的營業登記，附上公司的稅單，就是報稅資料。要附很多的東西，他才肯讓你辦護照.....那 1979 年還沒有開放觀光的話，旅行社代辦。然後去找那個商務公司，就是所謂一般我們所講的開公司。然後跟他協議好.....大部分的話都是旅行社幫他（旅客）找，因為旅行社要做這個生意。所以一定要去幫他（旅客）找。所以那個時候出國團費特別貴，這個費用有包含在裡面。（蔡進祥訪談，2015 年 5 月 20 日，新北市）

然而，根據業者的訪談，當時臺灣民眾出國旅遊的動機強烈，旅行業者不需要透過刊登廣告招攬顧客。而複雜的出入境、結匯等手續，也讓出國觀光變成一件困難耗時的規劃與安排：

一般的話，旅行社在 1979 年比較好做事，因為那時候出國比較困難，做廣告的也很少。那個時候旅行社也不多，行銷大部分就是透過口碑，口耳相傳。那個時候沒有網路，什麼都沒有，當然只有報紙而已，連電視廣告都少，只有報紙可以登。（旅行社）登報紙廣告其實也很少，因為僧多粥少，是你來求我。我根本不用去找客人，每一個月都排一堆。那個時候都要半年以前就要排了。譬如說，你現在跟我講說：能不能出國。喔，OK 啊，可以，但是你可能要排到七個月以後。他說沒有關係，你先幫我辦，因為他辦護照跟連同辦簽證，時間最起碼要兩月以上。不是說我要出國就出國，沒有那麼簡單，那時候出國很難（蔡進祥訪談，2015 年 5 月 20 日，新北市）

在此脈絡下，出國旅遊在尚未正式開放海外觀光的臺灣社會，從事者必須克服繁瑣的手續，乃是屬於少數擁有較多經濟資本、中年人的奢侈休閒實踐。同時，由於海外觀光申請不易，海外觀光的模式也以多天、多點、多國的方式為主：

那時候出國的話，能出國這些人都很有錢。多點、多天數、多國家這是最基本的，比如說現在的東南亞，菲馬新泰港，從五個國家走 12 天，或是 14 天。（蔡進祥訪談，2015 年 5 月 20 日，新北市）

受限於海外觀光繁複的申請手續以及經濟資本、兵役限制等規定，透過深度訪談可以發現，當時參與商務考察旅行團的臺灣人，多半是中年夫妻結伴成行。受訪者在訪談中提及當時的旅遊趨勢，鮮少有單身女子或男子單獨或結伴參與旅行團，旅行團多由成雙的夫妻組成。

有錢又有閒，大概他的年齡辦商務考察的年齡，應該最少都要 45 歲。如果是 45 歲以下的話呢，可能的話呢是某一些富商的子女.....。那個時候幾乎都夫妻一起去，那個時候沒有低年齡層次的，就沒有那種所謂的兩女或是兩男的那種很少，幾乎都是夫妻。如果（團）裡面有 36 個人絕對有 18 對夫妻，幾乎那個時候大概百分之九十幾都是夫妻。（蔡進祥訪談，2015 年 5 月 20 日，新北市）

由旅行業者的深度訪談可以發現，當時臺灣人以商務考察名義組團海外觀光，在旅行團的模式中，女性多半是與配偶同行的中年女人。然而，同樣透過深度訪談，1970年代末期也出現了獨身女子海外自助旅行的實踐模式，並且成為1980、1990年代臺灣女性旅遊文學的重要基礎。自1990年代起出版多本遊記散文的旅行作家丘引（本名黃隨，1957年9月5日出生）在1970年代末期開始自助旅行，同樣透過商務考察的名義赴海外旅行：

出國我得去掛一個業務經理的名義才能出去。因為是要「業務考察」。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管制外匯，我們只能去從外國賺錢進來，不能拿錢出去花。（丘引訪談，2015年4月15日，台北市）

（第一次自助旅行，當時）台灣非常封閉，完全沒有外國資訊，等於是瞎子。所以我一下飛機就問人家說：「哪裡有便宜的旅館，哪裡可以吃」。去吃飯我就問人家，就這樣一直聊，那我可以去哪裡走走逛逛？可以看甚麼？新加坡有甚麼？就開始這樣耶。然後我就發覺講台語也可以，怎麼那麼好玩，原來新加坡講台語也行，反而說國語還不是那麼通，所以在那邊就很如魚得水，就一個人啊。（丘引訪談，2015年4月15日，台北市）

透過訪談可以發現，在海外觀光尚未開放的時代，臺灣人的海外旅行已經展開，出國旅行逐漸成為熱門的休閒實踐之一。臺視出版的第924期《電視周刊》的報導，1977（民國66）年12月10日臺視已經有一個介紹世界風土人情的「大螢幕」節目，顯示這個海外觀光尚未正式合法、開放的年代，海外旅遊節目已經開始出現在大眾媒體上。依據同一個文本，當時的節目主持人為方晴，顯示臺灣旅遊節目早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就出現女性擔任主持人的情形。

以介紹世界各地風土人情為主的「大螢幕」，自從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正式撥出第一集，到現在已有兩年多的歷史了。在這期間製作單位曾陸續地到過非洲、歐洲、美國等地方去拍外景，將這些異國地區的名勝古蹟以及特殊而具有代表性的風物，一一呈現在螢光幕上。（電視週刊，1980，924：50-51）

二、1980年代：臺灣人海外觀光風起雲湧

（一）1979年1月「觀光護照」核發

承前所述，臺灣社會在1979（民國68）年1月，第一本「觀光護照」正式核發，海外觀光無須再藉商務考察名義行之。透過當時臺視《電視周刊》的報導，臺灣社會興起了海外觀光的熱潮。「四海包機」是當時的產物。2011年相聲劇《那一夜，在旅途中說相聲》在臺灣演出，創作者賴聲川在媒體訪談中曾提及1978年出國留學即是搭乘「四海包機」。

那時候出國，是很悲壯的一件事，因為是單程機票。所有人都是單程機票。那時候的事，我們還都有寫到劇本裡，叫「四海包機」，最便宜的那種。王（偉忠）：那可是留

學生的包機。賴（聲川）：一般的 747 客機，一列是三個位子、四個位子、三個位子。包機雖然也是大型的，座位是四、六、四，想就知道很擠嘛。當時要到舊金山，得從台北飛香港、香港飛福岡、福岡到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到西雅圖，再飛洛杉磯，最後回到舊金山。一趟要花卅個鐘頭。（廖俊逞、朱安如，2011）

「四海包機」旅遊的模式在 1979 年開放海外觀光後仍然存在，當時臺視《電視周刊》就與四海包機聯合舉辦東南亞旅行團活動。由文本分析可以發現，1979 年臺灣開放海外觀光後，多天數、多點、多國家的團體海外旅遊形式仍然是旅遊的主要模式。

「太好玩了。」台視紅星姜鳳書回味無窮的說，她剛參加本刊與四海包機聯合舉辦的東南亞旅行團活動回來...馬尼拉是 15 天旅程的第一站...團員中有很多人和姜鳳書一樣，是第一次出國，第一次搭飛機做長途旅行。（電視週刊，1979 年 7 月 29 日，頁 46-47）

（二）國族主義、心靈成長：名女人的旅遊經驗媒體再現論述

早在臺灣開放海外觀光前，臺灣社會對於出國旅行的諸多想像來自於旅遊文學。女作家三毛（本名陳平，出生於 1943 年 3 月 26 日）被視為當時臺灣社會重要的旅遊作家。1976 年出版《撒哈拉的故事》一書紀錄其在西屬撒哈拉沙漠的生活，掀起「三毛熱」。1981 年《聯合報》贊助三毛前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寫成《千山萬水走遍》一書。2011 年為了紀念三毛逝世二十週年，臺灣皇冠文化集團舉行的三場紀念講座中「跟著三毛一起去旅行」就是其中一個主題。顯示臺灣社會早在海外觀光開放之前，就出現成熟的女性旅遊文學市場。女作家作為女旅人是當時女性旅遊論述的重要來源。

進一步檢視這個階段的媒體論述可以發現，女明星、女主播等「名女人」在旅遊資源與資訊相對缺乏的時代，是臺灣社會瞭解海外觀光的重要對象。1979、1980 年代的《電視周刊》出現許多名女人的旅遊經驗。而海外旅遊見聞，亦是當時電視節目重要的內容。1980 年 5 月 11 日晚上 8 時，臺視綜藝節目「百花宮」開播，主持人為張俐敏。該節目中就闢有「海天遊踪」單元，由主持人赴海外錄製異國風光：

「結束德國行後，張俐敏依依不捨回到祖國。她準備將所看到的「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異國風光，提供大家與她共享。這些精彩片段，預計在七月中旬「百花宮」新聞的「海天遊踪」一欄裡與大家相見。」（常言，1980，頁 81）

除此之外，臺灣社會第一位女性新聞主播周嘉川，亦於 1979 年出版《歐美采風錄》一書（周嘉川，1979）。顯示臺灣社會在海外觀光發展之初，名女人的旅遊經驗即是媒體再現的重點。1984 年，由國內報刊影視記者票選，獲《電視周刊》「十大節目」選拔的聯播節目「天涯若比鄰」被認為「拓展了國內觀眾的視野，也增廣了大家對世界各國風土文物，及民俗等方面的見聞」，當時的節目主持人為陳月卿，前往世界各地出外景，她也是女性。顯示臺灣在早期的旅遊節目製作上，就出現以女性為主持人，帶領觀眾瀏覽海外風光的特色（夢

非，1984，頁 66)

進一步析論文本，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氛圍中，大眾媒體再現女性海外觀光的經驗時常帶有濃厚的國族主義色彩。1979 年，張俐敏為當時臺視另外一個電視節目「大銀幕」於歐洲錄製外景節目，在《電視週刊》訪談中談赴歐的心得，提及「在離開雅典的前一天，正逢先總統 蔣公逝世四周年」，海外觀光不忘國家領袖，顯示當時臺灣社會「海外觀光」節目錄製所具有的國族主義意涵：

她對旅居希臘的同胞說：「大家一定都很關心，美匪建交後國內的處境，但是大家可以放心，我們站得很好，站得很穩，沒有人能打垮我們。就拿我們這次出外景來說，有幾個國家能像我們一樣，跑這麼遠來為一個節目拍攝外景？像希臘本地，彩色電視和彩色節目都不普遍，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我們很繁榮，很安定。這不是宣傳，而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事實。」（電視週刊，1979 年 7 月 8 日，頁 45）

出國的確要行李愈簡單愈好，一個旅行用帶輪子大皮箱足夠了，千萬不要想大量採購外國貨，因為實在只有台灣的國貨又好又便宜。（電視週刊，1979 年 7 月 29 日，頁 48）

由文本可以發現，1979 年代開始，海外觀光已經是臺灣社會重要的休閒實踐主題之一，許多電視節目錄製與海外旅遊相關的節目，女性主持人、女主播等名女人是在大眾媒體中「帶領」觀眾海外觀光的重要角色。然而，海外觀光「宣揚國威」，作為臺灣經濟發展的證明亦是媒體再現的重點。而「出國不媚外」則反映在「愛用國貨」的倡議上，主流媒體反映出海外觀光對於臺灣社會集體的國族意涵。在這個階段，海外觀光是現代性與國家發展的重要象徵，具有重要的國族意義。臺視《電視周刊》第 936 期的報導中，一篇〈楊雅卉要樹立她的新形象〉文章中，描述旅行對於女藝人「行萬里路，增廣見識」，但赴日卻被認為「長得和日本人相似」的女藝人，在報導中強調「我要像中華民國的女孩子，幹嘛像日本女孩」（怡寧，1980，頁 78），均反映當時海外旅遊「開放」後那個原本透過國境管制鞏固的國族認同與情感仍然存在於主流媒體對於女性旅人的再現中。然而，在這個階段的文本中，海外旅行對於女性而言具有的海外旅行對於女性而言具有的「心靈成長」、「知性」意涵已然出現在（名）女性旅人/旅行的媒體論述中。

話題又轉回這次中東歐洲之旅。「你覺得出國一趟回來，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問她（張俐敏）。我覺得最大的還是心靈上的收穫。以前我常常會在節目水準上放鬆自己。這次出國一趟，走過的地方彩色電視都不普遍，節目也比我們差，再加上雅典那感人的一夜，各種感受，都使我重新肯定自我，肯定存在的價值，以及應在崗位上加倍努力。所以我想，我會更加敬業，更加自我要求，自我期許。」（電視週刊，1979 年 7 月 8 日，頁 49）

（三）自助旅行熱潮興起

1980 年代初期，隨著海外觀光風氣日益興盛，自助旅行的倡議也在當時的臺灣社會開始發酵。平面媒體如《民生報》在 1980 年代就有「戶外活動新聞版」並在 1985 年刊登一系列「自助旅行樂系列專文」。而這個階段的自助旅行有著「探險式」的特色，1985 年 9 月 7 日《聯合報》與《民生報》合辦的「探險式自助旅行心得演講會」，會場在《聯合報》第一大樓禮堂，聽眾人數達 800 人以上（民生報，1985 年 9 月 8 日），顯示當時臺灣社會在開放海外觀光之初，自助旅行的旅行方式就已經出現了。在當時的報導中，也可以窺見對於自助旅行的性別想像：

自助旅行的觀念，自從馬中欣四年前在國內首倡後，像一陣春風，喚醒了無數心有戚戚焉的四方志士……雲遊四海，投身五花八門彩色世界，體驗人生，也是千萬人心底已久的「夢想」。可是風氣未開，女性受保守傳統的束縛，不敢揹起背包獨闖天下。男孩子則有未滿卅歲不能出國觀光的限制，卅歲後，又少有人能擺脫事業家庭羈絆，單身邁向異地旅行。「男兒志在四方」彷彿成了某些中年生意人的專利。（黃安勝，1985 年 9 月 8 日）

由此文本可以發現，1980 年代的臺灣社會，海外觀光對於年輕臺灣男性而言，可能有著兵役、事業的束縛；女性則受到「保守傳統」觀念的限制，使得自助旅行成為「中年生意（男）人」的專利。然而，在當時的媒體報導中，已可見許多公、教或是任職於旅遊業的中產階級女性自助旅行的範例：

擔任學校老師，可能是最適合出國自助旅行的職業之一...擔任國小老師的張玉妹，連續三年來都利用暑假自助遍遊歐美，花錢不多，收穫卻很豐富。（黃安勝，1985 年 9 月 30 日）

彰化縣政府九位女職員，一年多來利用假日從事自助旅行，足跡遍布國內風景區，她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但同事稱羨，也成了大家口中的「單身貴族」。（民生報，1985 年 12 月 31 日）

出國一趟，和在國內旅行獲益程度不同。唯有身處異地，在完全聽不到國語的地方，才能真正休息，忘掉周遭所有煩慮。而對一個每天和小孩相處時間很短的職業婦女來說，這一段旅行，可以大大拉近母女的距離，讓小孩認識母親輕鬆的另一面。（黃彩娟，1988 年 3 月 9 日）

由文本分析可以發現，1980 年代從事自助旅行的女性，多半是公、教以及旅遊業的從業人員，旅行不再是中高齡「有錢」男性或夫妻的專利，女性作為自助旅行的主要行動者在 1980 年代初期已經確立。這些女性旅人可能是未婚的「單身貴族」也可是「職業婦女」。此外，在這個階段，文獻整理中描述的「旅行」是個體將身心從日常社會環境與規範中抽離「自助旅行」(Andrews, 2005; Thomas, 2005; Jordan & Aitchison, 2008)；以及當代女性描述

休閒時時常描述休閒增強她們的自信，讓她們覺得自己有能力（劉耳等，1996）的論述，也出現在 1980 年代臺灣女性海外（自助）旅遊的論述中：

（胡茵夢）她宣布明年要去紐約，去修習一些「方法演技」。她很推崇羅勃狄尼洛在幾部電影裡的演技，「臉、性格都完全不一樣」。見賢思齊，「我太需要去充點電了」，她說。（寧怡，1981，頁 78）

從羅馬、瑞士到倫敦，鄧麗君就像一個雲遊者，周遊列國，她相信「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去了這麼些的地方，對她的見識有不少的益處。（沈玫，1984 年 4 月 15 日，頁 81）

越來越多女性，喜歡投身於這種具有更大冒險性、自主性與趣味性，而且是高品味的度假方式-自助旅行。她們掙脫一向被視為柔弱膽怯的形象，義無反顧的展時淡忘功課、走出家庭、拋開工作，去尋求更寬廣的視野。（劉雲英，1988 年 3 月 25 日）

由 1980 年代的文本可以發現，自助旅行除了不再是「名女人」的專利外，自主旅行對於女性心靈知性的強化，是 1980 年代臺灣女人自助旅行論述的重點。自助旅行被視為「高品味」的度假方式，在 1980 年代的臺灣社會逐漸被建立起來。而女人從事自助旅行，則被視為是衝撞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柔弱膽怯）而有自主、冒險與趣味的意義。如同文獻整理中 Aitchison（2004）的論述，當代的休閒能使女性衝破嚴格的性別角色規範，成為認同建構、抵抗與協商的核心。換言之，當對於既有性別規範的衝撞產生，各種抵抗、協商與妥協形式也會存在。在本研究所蒐集的文本中，也可見 1980 年代臺灣女性有意赴海外唸書，看似衝撞了既有的性別期待，但個體仍必須（自我）說服「這絕非女權宣張」的論述。1983 年臺灣電視新聞主播沈春華有意前往海外留學，在訪談中她提到：

「我絕不主張女權伸張，我只希望婦女們能找出一條路來，過著快樂的日子」（常言，1983 年 12 月 11 日，頁 92）

（四）自助旅行的阻礙：女旅人被凝視的危險公共空間

如同本研究文獻整理中所描述，公共空間乃是性別、階級等建構和脈絡的產物。在父權社會中，公共空間往往被再現成對於女性隱藏了危險，「好女孩」應該要遠離部分公共空間（Green & Seabrook, 2004），而這樣的規訓往往必須透過個體自我監視的過程來完成。海外旅行的空間作為一種公共空間，其隱藏的危險性也成為臺灣 1980 年代女人海外旅遊論述的再現焦點。1985 年 11 月 30 日，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邀請自助旅行者陳德立和歐洲日報採訪主任陳揚琳，以「萬水千山任我行，自助旅行面面觀」為題，演講自助旅行心得和經歷，吸引了近兩百位聽眾參加。翌日《民生報》的報導中強調，這場演講「幾乎清一色女聽眾」，演講內容亦聚焦女性自助旅行的安全準則上（民生報，1985 年 12 月 1 日）：

面對幾乎清一色女性聽眾，曾經出國自助旅行的陳揚琳和陳德立不約而同地說，女孩子

最好不要單獨自助旅行，而以二人到四人結伴最理想……女孩子體力較弱，除非平常就經常爬山，否則一出門幾個月，自己扛行李，平均每天走十公里的路，女孩子吃不消。在住的方面，歐洲有些青年自住旅社是男女混合居住的，有時與異性共處一室，我國女孩子會不習慣……此外，在應變能力上，我國女孩子從小受父母呵護，不准這樣、不准那樣，並未教導在面對問題時如何處理的方法，當出國自助旅行遇到突發狀況，無法立即正確反應。(民生報，1985年12月1日)

由這則文本分析可以發現，海外旅行空間的「危險性」是女性從事自助旅行的最大可能困境。儘管臺灣女性踴躍自助旅行，但仍然因生理性別而被建議「不要單獨」行動，旅行的空間被視為對女性具有隱藏的危險；而女性「天生體力較弱」的生理決定論述也是臺灣1980年代女性從事自助旅行時的重點。相似的論述，在整個1980年代的相關女性自助旅行論述不斷被複製。

張玉妹說，如果女孩子注重安全，可請各車站或車站附近的旅客服務中心介紹旅館，講明要最便宜、不附淋浴室的房間，否則國際青年之家也很安全，初次出門的女孩子不必害怕。(黃安勝，1985年9月30日)

周詳的計劃加上小心的行動，即使是初次出國的單身年輕女子，照樣可以自助的方式，一償週遊列國的心願。(黃安勝，1985年9月27日)

直到1988年《民生報》「戶外活動新聞版」的「自助旅行答客問」專欄中，仍刊載讀者來信提問「我是女性，體力並不好，是否能忍受得了旅行中的艱苦與勞累？」(民生報，1988年7月11日)。承前所述，依據Green與Seabrook(2004)的論述，女性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外出恐懼，特別是也晚，而這種恐懼往往和「危險的男人」連結，因此前述文本中「男女混和居住」、「與異性共處一室」就構成臺灣女性自助旅行論述中的危險因子。有關女性自助旅行的「安全守則」，在1980年代的女性自助旅行論述中十分常見。

(訪問21歲的單身自助旅行女性，在義大利遇到男人搭訕)沒什麼好怕的。只要妳穿著樸素，舉止大方。他們一樣很尊重外國女子的……不過，為了自身安全，單身女郎應盡量減少夜間外出的機會。住宿地點，不妨選擇較靠近繁華熱鬧的交通樞紐區。(劉雲英，1988年3月25日)

女孩子出門旅行，最好避免海外「豔遇」，遇到陌生人搭訕或流浪漢接近，還是不要把他們當「好人」為妙(民生報，1985年12月1日)

尤其在義大利，曾有女性自助旅行者被多情的義大利男子「騙」的例子。(民生報，1985年9月8日)

昨晚在台北獅藝文中心舉行的背包行囊遊世界發表會上，李樂詩特別提到，女孩子要提防英俊的男子，他們有些人不懷好心，見到單身女孩子旅行，會主動來搭訕、請吃飯或喝酒等，如果應付經驗不足，很容易受騙。接著，他認為女孩子要有先見之明，因為外國人經常把「達令、甜心、寶貝」之類的話掛在嘴邊，中國女孩子乍聽千萬不要飄飄然。(民生報，1988年7月11日)

在1980年代有關女性自助旅行的各種安全守則、叮嚀與提醒論述中，可以發現與前述Jordan與Aitchison(2008)探究西方旅行論述時，發現女性總被再現為性凝視的客體。女性在自助旅行的異國空間中是具有高度風險的身體，必須「減少夜間外出」、「穿著樸素、舉止大方」同時「避免豔遇」可能帶來的風險。就連旅遊節目「天涯若比鄰」的女主持人，當外景節目錄製時「『涉足類似台北萬華綠燈戶』的阿姆斯特丹紅燈區」也是一件令她感到「尷尬」的事(夢非，1984，頁66)。

(五) 謹記「女性出國須知」的年代

承前所述，1980年代臺灣自助旅行風氣盛行，女性從初期就是重要的自助旅行實踐者，各種分享會、演講媒體報導與旅行書籍相繼出版，1980年代的女性旅遊論述瀰漫者一股「旅遊須知」的時代氣氛。1982年戶外生活雜誌觀光叢書出版了由張靜雯主編的《女性出國觀光指南》；1987年，戶外生活雜誌觀光叢書再出版《女性出國須知》。從書名便可得知是一本「針對女性」的旅遊參考書籍。然而，該書雖以單一第一人稱女性為作者的角書寫度，但出版社卻未註明作者姓名。經筆者探詢，出版社表示，年代久遠，已無從得知。在該書的序言(頁3)中描述到當時國人(尤其是女性)出國風潮初興的歷史脈絡：

從民國68年開放觀光以來，許多人都爭相出國旅遊，其中以婦女不受30歲始得出國觀光的限制，所以增加的人數就特別可觀。(頁3)

從此段序言中可以發現，儘管已經解嚴，當時台灣男性仍面臨較為嚴格的兵役限制，女性因免役在「出國旅行」這件事情上，看似享有較大的自由。然而，序言中的一段描述，則凸顯了當時對於「女人出國旅行」的主流論述，正如同前文中描述，再現生理女性「天生體力不如男性」：

自古以來，女性因體力不如男性，以及受制於生理因素的影響，常視「出遠門」為畏途。如今，雖然社會開放，婦女已走出廚房，甚至海闊天空地遨遊。但是，不可否認的，出門的顧慮仍比男性多。(頁3)

在這段描述中，「旅行」的空間想像被認為屬於「外」和女性所屬的空間概念「內」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旅行中的「身體」是強壯的，女性則「體力不如男性」，兩者均再現出當時「旅行」在空間與身體上的性別想像與意義。儘管隨著歷史時空條件的轉換，女性的旅遊處境變遷。但隨著「性別」而來的旅行限制，依舊主導女性的休閒。

就拿化妝來說：婦女出門化點妝是常事；然而，因是界各地的氣溫、濕度不同，有些慣用的化妝品可能不適合該地的氣候，甚至會引發副作用，結果皮膚敏感、紅腫著臉，把遊興破壞無遺！此外，因為生理因素，有些準備事項及使用各國洗手間的知識必須特別留意。(頁3)

此段論述中，「女人天生愛美」的性別化身體邏輯躍然紙上。「化妝」此一父權制度中對於異性戀女性身體裝飾的期待，被普遍化為每一個女人均應從事的「常事」。當「女人化妝是常事」意味著「男人不需要化妝」，旅行可能面臨的空間轉換、自然條件的變動，就造成了「女人出門較為麻煩」的旅行性別論述。至於「生理因素」，從後文可以得知，作者指得是「生理期、月經、大姨媽...」，正因為這種專屬生理女性的特殊身體狀態，女性的旅行體驗必須增加對於洗手間的常識，同樣是在描繪女性身體與旅行空間時，強化女性因為生理性別可能帶來的「麻煩」。

如同前文所述，女性在旅行中所遭遇的「凝視」往往和「風險」(恐懼)連結。序言的論述強調，旅行的女體乃是被凝視的，「婦女出門在外，尤重安全」則彰顯出父權論述中對於女「性」的擔憂與限制，在「賺賠邏輯」的醞釀之下，旅行的女體被視為處於高度風險之中，需要「防衛」；威脅的來源則是「外國男士」；對單身旅行的女性而言，旅行的空間則被想像為存在著風險、性的冒險、危機與誘惑。

進一步分析該書，作者以「旅行前應有的準備」、「皮箱中該裝些什麼」、「飯店和洗手間」、「應對須知」、「化妝須知」、「購物須知」、「附錄」為全書的架構。在「旅行前應有的準備」的中，作者以「曾經身為某旅社的顧問，期間約一年(頁9)」的專業者自居，描述「女性缺乏主體性的觀光旅行概念。(頁8)」：

這是一般年輕女性易犯的毛病...根據當時的經驗，一般年輕女性，選擇的觀光地區，最多的首推夏威夷、歐洲、美國本土次之。可是，說到旅行的目的，大多茫然無知，她們只有一個念頭佔據了她們的心：去了再說，何必為「目的」重重操心？對這種女性顧客，該如何安排日程表，的確是令人頭痛欲裂的事。(頁10)

從該書的論述中可以發現，作者儘管以第一人稱女性為書寫角度，但論述的位置無疑是「男性」的。因為，當「女性缺乏主體性的觀光旅行概念」並非因人而異的狀態，而被普遍化為整體女性的瑕疵。換言之，當作者指責「女性」的「缺乏主體性」，其自身論述位子必然是「擁有主體性」的「男性」。女性的從觀光地點的選擇、旅行的目的均是「指正」的對象。反映出的論述是「旅行不能沒有目的」，純粹的休閒、無為放鬆或不預設目標的旅行，是「不正確」，是「茫然無知」的。此套論述揭示了在父權制度中對於男性女性氣質的兩元想像與期待被置放到旅行的論述中，女性氣質遭強化的「無目的、無知、柔性」被視為和「充滿目的、知性、男性」的旅行，是格格不入，而需要「教育」。因此，作者緊接著建議女性出國「先到歐洲，好處多多」，並羅列出許多理由。

歐洲那些民主國家，對初次做海外旅遊的人來說，在安全上絕不會發生什麼問題。3. 可充分滿足女性的夢和憧憬。4. 雖然是身處外國，但是心理上不至於會讓妳產生失調的感覺.....8. 到處都可以碰到祖國的同胞...10. 不必像男性旅客那樣容易受到異性的詐騙。11. 隻身旅行，還不至於有什麼危險。女性可以隻身旅行，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獨自可以自由走動，妳很快就融進那個國家的種種。(頁 11)

在文章中，象徵了「先進、文明」的歐洲國家被描繪成「安全」的旅行空間，既然「安全」做為女性旅遊的首要條件，歐洲自然成為被推薦的旅行地點。此外，歐洲和「女性的夢和憧憬」被構連出來，再度以二元的性別氣質想像來界定女性的旅行需求。在此論述下，女人的旅行並不是「知性、冒險或勇敢」的化身而是「無知、憧憬與夢想」的象徵。文章中描述了一個「A 小姐」的旅行體驗，則更強化了這套論述：

我注意到每一張照片上她的衣服，張張不同，不免想到：帶這麼多衣服，行李有多重？帶著那麼笨重的行李忙著觀光有多累.....她在每一張紀念照背後，至少都編了號碼和日期，還算是有點整理資料的腦筋.....據我猜想，當時的 A 小姐，大概由於夙願得遂，只知陶醉在「人在歐洲」那種情調，而把嚮導的說明詞不當一回事，也就是說，只沈溺在：「啊，歐洲，我終於到了夢寐難忘的歐洲，好棒喔！」這種六神俱迷的境地(頁 17)。

自從她作了一次歐洲之旅，回來以後，公司的同事待她十分冷淡，人緣大不如前。(與 A 小姐同公司的「年長」女同事轉告作者原因)「她啊.....回來後不知收斂，大事誇耀歐洲的見聞，女同事多半是看不慣她的自私，半是嫉妒心，由此惹起大家的公憤(頁 19)。

論述中再次強調「知性/憧憬」的二元對立，旅行必須是「知性」的，身為旅行者，必須對於景色、典故、歷史背影有所掌握，才是「真正」的旅行了，這種兩元劃分則和性別的二元對立建立了等號。此外，作者描述了 A 小姐因為述說旅行經驗而被同儕(女性)排擠，顯示了當時的旅行做為一種符號的消費，具有型塑認同的意義，但「低調、不宣揚」是當時擁有旅遊經驗女性的行為守則。作者更提出「女性之間的人際關係，實在容易扯出一大堆麻煩來」，換言之，A 小姐的處境並不被視為是「特例」，女性的特質與污名化再次被普遍化。最後，作者質疑 A 小姐沈溺在「迷境」中，以致於無法深刻的遊歷歐洲之後，作者強調 A 小姐有了「遲來的醒悟」，希望能存夠錢，再前往歐洲旅行。但是卻又遇到另一個困境：

她的煩惱就在：極想再去歐洲，好好觀光，以補第一次的不足，可是，又想也該考慮終身大事了(頁 20)。

此論述也反映出，當時台灣女性的單獨旅行體驗，以「婚姻」為分水嶺。隨著步入婚姻制度，可能面臨離開職場、進入母職等削弱旅行資本(經濟、時間、空間)的處境，海外旅

行的機會也會降低。最後，旅行中女人的身體則圍繞在「月事」的討論上，作者描述了月事與旅遊的關係：

每月該來的不來，不免令人擔心；來了，又令人無限憂悶，這可說是女性獨有的煩惱。談到女性的旅遊，這該是首應注意的大事，卻從來沒有人在這方面有所獻言。自從觀光開放之後，國內各報章雜誌幾乎一窩風的搶刊觀光知識、觀光經驗的文章，可是，看遍這一類文章之後，妳會發現，居然對這件事，隻字未提...只要有人問起，就悄悄地告訴她所謂的「經驗之談」，說穿了，它實在不是可以「大聲疾呼」或「侃侃而談」話題（頁 55）。

整體而言，在這個階段，台灣的女性隨著政治氛圍的轉換以及勞動市場的參與，單身的職業女性得以出國旅行，但透過一本專門為女人而寫的旅遊書籍所描繪出的女性旅遊論述，卻彰顯出女人旅行者的特質被視為柔弱、不理性、不知性和重視外表；海外旅行的空間則被描繪成充滿了凝視與危險；在旅行中，女人的身體則「麻煩很多」。儘管顛顛簸簸、「批評指教」不斷，台灣女人，在 90 年代之前，終究是走了出去。

三、1990 年代臺灣女旅人的海外旅遊實踐與媒體再現

（一）媒體再現：「繞著地球跑」的銀幕知性女旅人

1987（民國 76）年 7 月 14 日台灣解嚴，同年 8 月 25 日宣布開放大陸探親，開啟了台灣人赴陸觀光旅遊的契機，各種有關大陸的旅遊節目如雨後春筍冒出，擴展了臺灣旅遊節目造訪的觀光地區。1989 年 6 月 2 日，由台灣男性藝人凌峰製作、主持的《八千里路雲和月》在台灣電視公司播出，是台灣第一個介紹中國大陸風俗民情的電視節目，由凌峰擔任主持人，同時也偶爾參與外景主持，節目播出長達六年。主持人以知性介紹中國大陸歷史景點的典故，輔以人情趣味的訪問或花絮。到了 1990 年 8 月 11 日，中國電視公司的《大陸尋奇》（至今仍在播出，是中視最長壽的社教節目）¹，主持人一直是由退休的新聞女主播熊旅揚擔任，熊旅揚主要以棚內口白的方式進行中國各地歷史、地理、民情的介紹。主持人穿著套裝，髮型裝扮如新聞主播，正襟危坐如播報新聞一般，以字正腔圓的國語介紹大陸各地史地文化風情，對於中國大陸的風土民情介紹仍偏重歷史、人文的解說。

綜觀 1980 年代，海外旅遊節目均社會教育色彩濃厚，由 1980 及 1990 年代，台灣電視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獲獎的節目主持人，包含 1984 年中華電視台「天涯若比鄰」陳月卿、1988 年台灣電視公司「世界真奇妙」的柯志恩、梁旅珠、1992 年台灣電視公司「繞著地球跑」的李秀媛與謝佳勳、1995 年中國電視公司「大陸尋奇」熊旅揚均由女性主持人介紹國外風情人文的電視節目得獎。其中，1986 年「世界真奇妙」乃是台灣第一個自製的旅遊節目，主持人梁旅珠與柯志恩，主持節目一年後相繼赴美求學深造（梁旅珠，2010）。1988 年 10 月底節目由新主持人李秀媛、謝佳勳擔任。1990 年 10 月 7 日節目改名為「繞著地球跑」播出至 2002 年 8 月 30 日共 502 集。這個階段台灣的媒體女性旅人形象有著高學歷、海外留學、知性、外語能力強等特質，職業上也有著航空業的背景。「繞著地球跑」主

¹ http://www.ctv.com.tw/ctv_entertainment/entertainment_4/01.php

持人之一李秀媛談到當時參與節目主持人考試時的經驗：

我就看到報紙上，有看到梁旅珠跟柯志恩，主持了一年的「世界真奇妙」。然後她們就出國深造跟念書，把這棒子放下來。她們兩個都是高學歷，出國去念書。她們才主持一年就拿了金鐘獎，那當時對外招考，我的同事就幫我報了個名。（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謝佳勳畢業於文化大學中文系，曾經擔任華航空姐四年；李秀媛是高中畢業後，又到加拿大的某商專就讀，曾在美國工作兩年，她倆的外語能力都還算不錯，很符合「世界真奇妙」的條件。（華視綜合週刊，1988年11月13日，頁50）

梁旅珠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柯志恩赴美後去得美國南加州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如今是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所的創所所長（袁世忠，2006）。在此脈絡下，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的台灣大眾媒體再現中，期待女性旅人的角色有著高學歷、知性與女性化的文化菁英氣質。若旅遊節目錄製過程中，若造訪較「落後」的地區或女主持人的外在表現不符合這樣的期待時，就會受到閱聽人負面的回饋。李秀媛在訪談中曾經提到在節目中被改造成符合知性期待的經驗：

我是一直短頭髮，但是我被要求要留長頭髮。因為佳勳是長頭髮，她要梳左邊，我就要梳右邊，就是有個既定的形象，讓人家覺得妳是有知識的。（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觀眾還是挑的，就是他會覺得之前我們前面那兩個主持人是高知性，兩個講話都很優雅。那我跟佳勳主持以後，第一個我們走的地區都落後，第二個就是形象上，外型都是穿的很隨便，一個禮拜都沒辦法洗澡，看起來很邋遢。稿子也沒人幫我們寫。當時公司（電話線）只有4條線，所以每次（節目）一播出就被打爆，說「你們的主持人是哪裡來的，是撿來的，話也不會講。是在馬路上抓的嗎，一個大鼻子，一個大嘴巴，長的那麼醜」。（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觀眾）要白嘉莉那種型，要種漂亮斯文，細細嫩嫩。（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他們一直大概打造我跟佳勳，長頭髮的阿，穿套裝阿都是窄裙阿，還有很誇張的墊肩，就是進棚的時候麻，但是後來我有一段時間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先斬後奏，我把頭髮剪很短，從此以後就沒有留長過了，公司當天罵了一頓以後，也就接受了，然後風格就很明顯。（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在 1988 年 11 月出版的《華視綜合週刊》第 890 期，也紀錄了當時閱聽人的反應：

很難免的，觀眾容易將他倆與柯志恩、梁旅珠相比較，顯然的，新不如舊，但謝佳勳與李秀媛，希望大家給予她們一段時間來適應，相信她們的成績不會太差的。(華視綜合週刊，1988 年 11 月 13 日，頁 50)

由文本分析可以發現，有別於「世界真奇妙」時期梁旅珠、柯志恩的銀幕形象，「繞著地球跑」的節目製作與主持人形象鬆動既有 1980 年代台灣社會對於旅遊節目/社教節目女性主持人/女旅人的想像。女性在旅途中冒險、吃苦耐勞的形象逐漸被建立；女旅人旅行的空間不再僅是優雅文明的西歐，觀眾開始接受甚至期待新的女性旅人銀幕形象：

其實和那個時候女生的主持也有一個區隔。當時主持人都是張菲、胡瓜那些，女生大概都是副角的角色，是插花的角色。這奠定了女生強烈的企圖心，我們被包裝成吃苦耐勞。(李秀媛訪談，2015 年 5 月 28 日，台北市)

(觀眾)越來越期待的不是你漂亮的畫面，而要知道你冒了什麼險，有沒有受到騷擾，有沒有豔遇之類的，慢慢地觀眾就 focus 在這趟的驚險，如果這趟不驚險，就白出(外景)了。如果只走漂亮，介紹風光沒有人看。(李秀媛訪談，2015 年 5 月 28 日，台北市)

1995 年，李秀媛將「繞著地球跑」節目中的旅行經驗寫成《繞著地球跑：李秀媛冒險書》一書，該書序言由三位男性節目製作人以及李秀媛的妹妹寫成，內容多著重在李秀媛冒險、勇敢、「奮不顧女兒身」「不像個女人的膽量」的描述上：

以導演角度形容李秀媛，只能說「膽大包天」，每一次外景她都令人印象深刻，從日曬雨淋、蚊蟲蟑螂，女孩怕的她都不怕，而導演怕的，她也不怕。例如安全問題，懸崖峭壁看她爬上爬下，以為她「練」過，很專業……為了拍攝效果，她非常主動配合(除了不穿三點泳衣之外)，是一位絕佳主持人……亞馬遜河她深入密林找巫醫；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食人族是她朋友；紐西蘭的高空彈跳。(張龍潭，「繞著地球跑」製作人)

「另類女人」……我常常在想，其實秀媛是「另一種人類」，她開著一輛小 March 在台北街頭自由穿梭，任何場合、任何地點、任何環境，有時一天會見到好幾次面，她總是掛著笑容，誰會相信、誰能夠理解她已經全世界各地、各地的跑。(王偉忠，電視節目製作人)

「鍾愛冒險的二姐」...當別的女孩忙於戀愛、婚姻、家庭的時候，她仍然寄情於自己最鍾愛的冒險旅行。(李雅媛，李秀媛胞妹)

承前所述，此階段媒體再現的女性旅人角色、旅行身體與旅行空間面臨了轉變。媒體（旅遊節目）再現的旅行空間不再僅是「令人憧憬的歐洲、夏威夷」，亞馬遜河、巴布亞新幾內亞等過去和「文明、安全」無關的地區也是女人旅行的可能地點。此外，銀幕上的女性（旅人）不再僅是知性優雅，「膽大包天、自由穿梭、鍾愛冒險」開始被用來描述女性旅者。此階段媒體論述中再現的女性旅者，性別角色的多樣性有所突破，但知性、有教養的邏輯仍然，例如「不穿三點泳衣」就是一個例子。

然而，談到節目製作的過程，透過受訪者的經驗可以發現，台灣當時雖然開放觀光已經超過 10 年，但旅遊資訊，特別是東亞、西歐的旅遊資訊仍然十分匱乏，加上受限於當時傳播科技（網路）的發展。當時的旅遊節目主持人必須參與行程規劃、節目企劃以及拍攝當地的翻譯，整個工作團隊也是男性為主：

沒有現在的電腦，所以就每天守在辦公室，等美國的天亮，等中南美洲的天亮，然後跟他們那邊連絡，所有行程都自己排。(李秀媛訪談，2015 年 5 月 28 日，台北市)

我們一次 4 個人，1 個攝影師，1 個攝影助理，1 個導演，在加 1 個主持人，3 個都男生不講英文。然後只有我，我就是他們的保母，然後兼翻譯，然後兼導遊兼溝通。
(李秀媛訪談，2015 年 5 月 28 日，台北市)

在此脈絡下，當時女性的旅遊節目主持人，面臨來自家庭（家長）的阻力，因而發展出各種應對的策略。受訪者李秀媛就提到，當時的節目團隊組成以及工作內容，讓母親替她感到擔心，外出工作，她對於家人的關心採取「報喜不報憂」的策略。

女孩子自己出去，老實說，家人那個時候是擔心的，像我媽媽就不讓我去。她說第一個出去這麼多天，妳跟這麼多男人，這些男人是好人壞人又不認識，我們每次出去都換 team 嘛，也不是固定的 3 個... (又) 不安全，因為我們沒有連絡方式，沒有大哥大，沒有什麼的，像我進亞馬遜河，進這種很落後的地方，就是幾十天十幾天不出來..... (媽媽) 她哭啊，她就說妳可能進去沒幾天就失身啊，可能就回不來 (李秀媛訪談，2015 年 5 月 28 日，台北市)

整體而言，在 1990 年代媒體再現的女性旅人形象開始發生轉變，女性的銀幕旅遊符號不再僅是知性、女性化，冒險犯難、膽大包天的女旅人形象出現；女性旅遊空間也更為擴展。在 1994 年加入「繞著地球跑」外景主持的曲艾玲，就談到當時閱聽人期待這些女旅人

帶他們遊覽的海外旅遊景點已經非主流的觀光地區。

國外我們一般都會跟觀光局或是跟旅行社來合作，他們有既定行程跟點，但是因為我們希望做到的不是只有觀光客去的地方。「繞著地球跑」我們那時候的一些路線是一般觀光客都沒有走過的。（曲艾玲訪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然而，傳統的性別二元論述依舊存在，女性的身體和女性氣質依舊和旅行有所扞格，因此，這樣的一個女性旅者，必然是「另類女人、不像個女人、奮不顧女兒身、另一種人類」，也因如此「當別的女孩忙於戀愛、婚姻、家庭的時候，她仍然寄情於自己最鍾愛的冒險旅行」。受訪者李秀媛在訪談中談到：

他們叫我李大膽，然後其實也說我基本上就不是一個女人，尤其是謝佳勳在我旁邊的時候，她是柔美的，它的點也比較多被安排在巴黎、倫敦。她媽媽都會給她買長的套裝裙子...我經常被派到那種巴布亞新幾內亞那種地方流浪，頭髮一向剪得很短，所以基本上都沒有人當我是個女人，然後後來是因為，多年不結婚我也沒什麼誹聞，別人也不會來惹我，所以他們就覺得我是不是同性戀。（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因為做了這個工作以後，它是很機動性的，今天要走妳就要走，然後明天妳要怎樣就怎樣，就不能兼顧家庭，如果要兼顧家庭，可能就要放掉妳的最愛。當時我是這樣想，也有很多人做了兩全，做得很好，可是我不認為我可以。（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跟我媽講說不要催我結婚，我媽叫我相親相了多少次，相到地老天荒。但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婚姻這個事情，我並不是特別排斥，但是我認為，我一直有個觀念，它會妨害我的旅行，那我覺得，旅遊對我來講是生命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它除了是工作以外，它也是一個愛，然後他它是一種就是讓妳可以不斷擴展，每天活在新鮮事裡。（李秀媛訪談，2015年5月28日，台北市）

承前所述，當新的女性旅人形象出現在1990年代臺灣的大眾傳播媒體文本中，冒險旅遊、總是在旅遊的「移動」與「風險」仍然被視為與傳統的女性性別氣質或是女性社會角色有所衝突，新形象的銀幕女旅人，在強迫異性戀機制的論述中，仍然是「另類」的女人，異性戀性傾向變得「可疑」。而在受訪者的反思中，經常旅行的女旅人在1990年代以來的臺灣文化中仍然是難以符合婚姻制度中的妻子角色。但這個階段銀幕上的女性旅人，旅行已經被她視為生命中重要的賦權實踐，比起異性戀婚姻制度更令她嚮往。

到了1994年，外景節目主持人曲艾玲加入「繞著地球跑」節目。透過其訪談，顯示在1990年代中期，臺灣海外旅遊節目對於主持人仍然重視外語能力，但過去以男性為主的節目製作團隊開始出現轉變。李秀媛參與早期的外景團隊，均由男性組成，僅有節目主持人是女性，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後，「繞著地球跑」外景團隊如編導、執行製作、外景主持人多為女性，男性主要僅擔任攝影和攝影助理工作，女性在旅遊節目製作中的角色更為多元。

（4-5人的團隊）我們裡面只有攝影跟攝影助理是男生，一般來講編導有可能是女的，然後再來就是主持人是女生，可能還會有執行製作我們都是女生。所以這些女生都要用男生的角度去工作。（曲艾玲訪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第一是資源比現在少非常多；然後再來就是女生要當男生用。我們出去也一樣要幫攝影師扛腳架，幫攝影師扛機器，然後呢我們要身兼數職，要能去翻譯溝通，然後還要去規劃整個行程。（曲艾玲訪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受訪過程中，曲艾玲同樣也談到在節目主持初期「銀幕形象」塑造的過程。由其經驗可以發現，1990年代中期，儘管女性旅人的銀幕角色與想像已經與1980年代不同，但新進主持人仍然感受到「更知性」的期待與規訓。

一開始我大概花了有半年的磨合期，因為一開始李秀媛和謝佳勳他們已經在這個領域裡面，我說8年可是他們已經做了5年了，所以已經有知名度和形象，那謝佳勳就是屬於很知性很優雅的，李秀媛是比較活潑比較有一點tomboy的感覺然後也很知性。一個短髮一個長髮，那時候接到我的時候，是想要把我塑造成他們的樣子。（曲艾玲訪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那妳走李秀媛這樣的個性好了，但是要知性，但是又要有一點點淑女，所以他剪沒有像男生型的頭，那稍微有一點女性化但是短一點，界於他們兩個中間，然後講話的時候要怎麼樣怎麼樣，一直在塑造一個型。做了半年以後每次出去我都很痛苦而且挫折感很大，有一天我就坐下來跟製作人講說，可以讓我做我自己嗎，妳可以讓我做自己，妳讓我試試看，他一直覺得很冒險。（曲艾玲訪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更進一步分析，承前所述，1990年代臺灣旅遊節目期待的女性旅人/主持人形象是具有高水準的語言能力，能夠進行國際交流，自海外留學回臺灣的曲艾玲，卻在節目主持過程中被認為有著「太過洋化」問題。

我覺得在那個年代，語言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因為那個時候能夠翻譯，從英文翻譯到中文，從中文翻譯到英文，就是要能夠雙語這樣的主持人應該不多。（曲艾玲訪談，2015年5月2日，台北市）

(製作人)覺得我太西化了，因為那個時候以 89、90 年代來講的話算是滿西化的，因為剛從美國唸書回來，中文也沒有像現在這麼順，那時候講話更 ABC 一點，他就會覺得太洋化了，他覺得要把你調教成他們兩個的中和點。所以就一直在壓抑我、壓抑我。到半年的時候我就跟他說我受不了了，就讓我做自己好不好。(曲艾玲訪談，2015 年 5 月 2 日，台北市)

整體而言，從「繞著地球跑」兩個階段節目主持人的生命經驗中可以發現，臺灣女性旅人的角色、旅行的身體與旅行的空間雖然在 1990 年代均更為擴展，擁有更多的可能性，挑戰了傳統的性別氣質與規範。但「理想」的女旅人/主持人期待仍然加諸在她們身上，各種順服、妥協與折衷在這個過程中出現

(二) 臺灣女人比男人更愛海外自助旅行

除了電視銀幕上的女旅人形象轉變外，1990 年代臺灣社會瀰漫著女性海外自助旅行的風氣，女性不但積極從事海外旅遊，更熱中自助旅行。此外，在普遍的媒體論述中，女性被再現為熱中出國旅遊：從事海外自助旅行的女性佔了絕大多數，遠遠超越男性。

日本某雜誌於去年 11 月所做的調查顯示，日本年輕上班族女性，最喜好的休閒活動之一就是出國旅行。(周雨，1990)

承前曲艾玲的訪談，她提及到了 1990 年代中後期，「繞著地球跑」節目開始組實質的旅遊團，帶領觀眾旅行。從報名的團員中可以發現，女性是主要的參與者：

你會發現我們繞著地球跑後來就是我做到第 4 年、第 5 年開始，我們帶團出去，觀眾跟著我們一起走，然後觀眾直接報名多半是女性，原因是因為他們對於我們信任，然後他們覺得我們去了很多地方，然後有安全感.....男生大概會有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情侶、男女朋友，但是有很多單身女性來報名。(曲艾玲訪談，2015 年 5 月 2 日，台北市)

由曲艾玲的訪談可以發現，1980 年代以前以中年夫妻為主的海外旅遊團模式，發展至 1990 年代，女性逐漸成為海外旅遊、海外自助旅行的主要參與者，單身、獨自一人的女性旅人日漸增加。1990 年 7 月 24 日《中國時報》家庭版刊登了〈女人自助旅行勇者〉一文，描述臺灣社會女性參與自助旅行的近況：

如果你還認為，國內的未婚女性仍然嬌弱如昔，那是太孤陋寡聞了。這幾年來日益興盛的自助旅行風氣，吸引了眾多年輕女子的加入，根據統計，在勇於向困境挑戰的自助旅行者之中，女性佔了九十%以上，男士都不及十%。(于模珉，1990 年)

然而，在這篇報導中，這樣「女多於男」的情形被視為「怪現象」，更進一步，1990 年代從事海外自助旅行的女性除了 20 多歲的年輕女性也有 30 至 40 歲的職業婦女，共同之處在於「未婚」：

對於這個怪現象，提倡自助旅行不遺餘力的「自助旅行通訊」發行人黃安勝也覺得不解，因為自助旅行雖然耗時，但是就條件上來說，男士不論體力和語言能力都不應輸於女士。他表示，國內眾多的女性自助旅行者中，二十歲上下的固然不少，可是也不乏三、四十歲的資深職業婦女，她們共同的特色除了未婚，還有一點是，不把職業當作成就感的泉源，反而，在她們的心目中，那些能夠靠一己之力，成功並且圓滿地達成自己自助旅行目標的，才是真正生活中的勇者。(于模珉，1990年)

媒體再現的1990年代女性海外自助旅行論述中，可以由海外自助旅行的女性認同中窺見1990年代臺灣女性出現新的自我性別期待與規範，婚姻、家庭與事業未必是成就感的來源，(海外)旅行是成為重要的成就感符號，是勇氣與心靈成長的重要實踐。在海外旅行的女人，也被一般女性視為重要的典範與「啟示」來源。1997年《中國時報》家庭周報刊登〈旅行，讓女人愈來愈勇敢〉一文

國內知名的美容專家黃麗穗，她也是酷愛旅行的女子，每年總是花大把的時間在國外遊山水，還寫過兩本旅行書《從旅行中成長》、《遊走世界學生活》。黃麗穗說：「我不是因為有錢才去旅行，而是旅行使我富裕」……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啟示：一個女人所以變得愈來愈勇敢，「旅行」正是加速催化的原動力。我也要去旅行了！（韓華，1997）

到了1990年代末期，臺灣有關女性與旅行的媒體論述中，臺灣女性時常被再現為「從小就有環遊世界的夢想」（藍朵，1998）。除此之外，在臺灣的觀光推廣的相關政府單位與民間企業，女性參與、位居主管的情形也越發普遍。1999年3月7日《民生報》戶外旅遊版刊登〈女人當家，一樣出色：四位駐華觀光單位女主管細說她們成功的故事〉一文，分別介紹梁吳蓓琳（時任觀光局臺灣公關代表）、劉碧珍（時任紐西蘭觀光局臺灣區經理）、黃莉惠（時任香港旅遊協會臺灣處長）與楊春玉（時任加拿大旅遊局臺灣區經理）：

（黃莉惠）20年前我剛出來作事，如果以人叫我女強人，我會生氣，但現在，若有人稱我女強人，我能同意。（張嘉倫、吳學銘，1999）

（楊春玉）她說，目前在臺灣從事觀光推廣，女性居多。觀光推展是項精緻、重視包裝的行業，也需要柔性的人際關係，女性有創意、細心、體貼、耐心的特質，能夠有較大的發揮。（張嘉倫、吳學銘，1999）

從文本中可以窺見1990年代末期，臺灣社會女性除了是海外旅遊的重要實踐者也是觀光旅遊組織的從業人員。從事旅遊產業的女性被視為「女強人」，其自身的認同也從排斥轉為接納。但當女性從事觀光旅遊產業，「細心、體貼、耐心」等「陰性特質」仍然被視為是女性的特質與強項。

承前所述，1990 年代海外旅行已經被女性視為重要的休閒實踐以及勇氣、心靈力量的來源。如同文獻整理中，Fullagar (2002) 的論述，女性書寫自身得以彰顯欲望和女性主體。書寫和旅行均提供了破碎的可能性，可能衝擊既有的性別論述。當休閒對於個體建構和形塑認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休閒不僅是工作的附屬品，休閒本身就是衝突和挑戰的場域 (Wynne, 1998)。換言之，在 1990 年代末期，當海外旅遊已經普遍被認為可以成為臺灣女性最重要的生命實踐之一時，旅行的書寫就可是女性經驗與認同的展顯。綜觀 1990 年代，1991 (民國 80) 年創刊 (2001 年停刊) 的旅遊雜誌《旅訊》，1991 年出版的雜誌中就有多篇女性自助旅行的經驗分享。如創刊號中〈我在尼斯遇到趙耀東〉(孫葆媛，1991)；第 5 期的〈自助旅行會上癮〉(劉春英，1991)、〈旅行的感覺真好〉(曾雅玲，1991) 與〈心動不如行動〉(張琇鳳，1991)、〈單身女子自助旅行實況：從尼泊爾玩到峇里島〉(陳素雲，1991) 均是女性書寫海外旅行經驗的文章。承前所述，旅遊文學書寫 1980 年代及 1980 年代以前僅屬於少數女性作家、名女人，1990 年代末期，旅遊經驗的書寫已經變得普及，甚至被視為一種「全民運動」。

如果仔細留意，會發現近年旅行的話題在媒體變得異常蓬勃，專業的旅行寫作也成了出版或報章媒體上另一種規格的文字作品。為了延伸「華航旅行文學獎」的層面，中華航空和人間副刊在歲末針對旅行的主題舉辦了兩場「旅行與文學下午茶」，將屬於平面嚴肅的思考轉化為輕鬆愜意的對話，同時也將「華航旅行文學獎」的意義加以放大，期待旅行寫作也可以成為一種全民運動。(劉愛貞，1997)

然而，1990 年代實踐海外 (自助) 旅遊的臺灣女人，仍然受到傳統女性性別氣質的期待與規範，她們仍然被視為是旅遊空間中承受高度風險的身體，被認為是需要「保護」。1991 年，《旅訊》雜誌中〈我在尼斯遇到趙耀東〉一文，作者孫葆媛描述了自主旅行時與曾任中華民國第 15 任經濟部長趙耀東在摩納哥相遇的經驗：

趙先生先是驚訝為何我們就兩位「小女生」獨自來到歐洲，未與家人或旅行團同行，經我們解釋是為「自助旅行」後，他甚為不悅，先是說「怎麼妳們父母應允妳們單獨至這般遙遠的國家，父母怎能這般放心？」(孫葆媛，1991，頁 75)

在此脈絡下被質疑、被擔憂的女性必須「我們始終與家人保持密切的聯繫，隨時讓父母知曉我們身在那裡，不會毫無音訊」(孫葆媛，1991，頁 76)。主持「繞著地球跑」外景的曲艾玲，在訪談中也分析了當時節目以及旅行團受到歡迎的重要因素是整體而言，臺灣社會仍然視異國旅行空間對於女性而言是具有危險的，「女孩子不該亂跑」：

那個年代出去觀光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所以當時為什麼繞著地球跑會變這麼受歡迎的節目。因為我們就是他們 (觀眾) 對於世界的眼睛，因為他們申請簽證也沒這麼容易，出國要花很多的錢，所以一般來講大家會說「女孩子幹嘛出去，女孩子你去那些歐美國家那麼危險」都會覺得女孩子就不要亂跑。(曲艾玲訪談，2015 年 5 月 2 日，台北市)

前述「好女孩應該遠離公共空間」的論述仍然存在。1994年11月31日《聯合報》刊登〈脫衣驗身打通關？〉一文，描述當時臺灣女子前往澳洲觀光，由於「不願與澳洲海關合作，最後被海關強行脫衣搜身檢查」（張必瑜，1994）而引起了輿論風波，文章中描述當事人，臺灣女性遊客的觀點並強調單身年輕獨立旅行的亞裔女性是國際海關人員的「查緝目標」：

她生氣了，好端端為何花錢受氣？孔夫子教育下的女子怎可隨便寬衣示人？他們生氣了，這名東方女子為何偷偷摸摸，不肯驗行李、搜身？分明有鬼！（張必瑜，1994）

「誰是查緝目標」最可疑的目標人物「塑描」則是：年輕、亞裔、女性、獨自旅行。原來，蔡小姐就是澳洲海關人員特別注意的重點人物。（張必瑜，1994）

由此文本可以發現，文獻整理中論述的「男性凝視」在異國的海外旅遊空間中存在，臺灣獨自旅行的女旅人除了承擔「孔夫子教育」的性別期待外，亞裔、年輕女性如同文獻中 Jordan 與 Aitchison（2008）的論述，既有旅行論述總將女性再現為「性凝視的客體」，甚至將旅行和性、享樂主義自然劃上等號。單獨旅行的女性是可疑的，甚至被認為性態度是隨便的，她們往往會意識到被凝視（Urry, 1990）。因此，1980年代常見對於女性「豔遇」的論述在1990年代中期仍然可諸大眾媒體。1994年2月2日《中國時報》家庭與婦女版刊登〈現代女性自助旅行小心桃色誘惑〉一文：

最近幾年來，台灣女性的自主性與獨立性愈來愈強，自助出國旅遊的人口也愈來愈多。由於日本女性性開放的效應所及，台灣女性到國外旅遊也很容易成為外國男性追求的對象，尤其是到歐洲，一些台灣旅行團的女性團員受到性騷擾的事情愈來愈多，甚至發生被騙財劫色的事情。

黃姓旅遊業者表示，異國愛情充滿了許多陷阱，如果沒有把握，女性最好不要單獨出國旅遊，畢竟異國的種種，有太多我們不了解的事情，而且身在愛情世界中，人往往會把理智關在門外。（趙惠群，1994）

整體而言1990年代，臺灣女人（單獨）海外旅行的意願越來越高，越來越多女旅人書寫旅途經驗，儘管傳統性別氣質的想像、規範與旅行所具有的開拓性、性別賦權意義仍然持續的辯證，傳統的性別論述仍然反覆再製，但1990年代臺灣社會文化中，獨自旅行、結伴旅行被視為女性重要生命經驗，旅人角色不再被視為與妻子、母親絕緣，此氛圍已然在1990年代末期已經形成了。如1990年10月5日《中國時報》家庭版刊登〈寵她就讓她旅行〉或是《旅訊》雜誌文章鼓吹「結婚之前，先來自助旅行」、「若是在決定終生大事之前，能先一起來趟自助旅行，想必可減少後悔的機會」（李淑菁，1997，頁7）。1998年《中央日報》的〈父權社會下永遠的遊客〉更是直接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切入，批判了長久以來旅遊空間被男性獨佔，女性被侷限在家戶之內處境。

在觀光據點訴說著男性歷史、土地，充斥著陽具崇拜的建築雕像下，女性始終在「男性眼光」下旅行於一個「男性空間」。甚麼時候，女性才可以突破這樣的枷（家）鎖？

即使到了現在，女性的旅行資源及機會仍不如男性優渥，女性旅途中遭遇的不遍及危險仍高於男性。所以現今出爐了一籬筐的女性旅行或出國須知、女性自助旅遊手冊來說明女性在旅途中可能會遭逢種種千奇百怪的問題，而這些往往不會發生於男性身上。（林怡君，1998）

各種鼓勵女人「出走」的女性旅遊論述在 1990 年代末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媒體論述中：

女人，多少次妳想獨自出去走走時，周遭總有聲音警告妳，獨自一個人很危險。其計畫旅遊的概念，循序漸進，自助旅遊一點也不難。就算妳不習慣一個人上路，找個同伴不就結了！（陸晴，1997）

媽媽丘引平日在家中擔當「家庭主婦」，但在職業欄上，她稱自己為「旅行家」，因為旅行是她生活的必要元素。當年結婚時，和另一半簽訂自由平等協約，互不干預對方，雖然老公不放心，協約約定在先，他也只能祝福妻子上路。婚前，她強調「除非結婚比單身更自由，否則不結婚」，婚後，她一個國度接著踏上另一個國度，拋開家沒有後顧之憂，專心旅行去。（牟迎馨，1998）

丘引，就是臺灣社會 1990 年代末期女遊論述中「不安於室的女旅人」中的一位（牟迎馨，1998）。

（四） 丘引：女旅人的策略

承前所述，1990 年代末期，臺灣女旅人的角色日益多元，妻子、母親的角色與冒險的旅人角色不再互斥。1990 年代末期，丘引（本名黃隨）以妻子、母親的角色單獨前往海外自助旅行或帶著子女同遊，並出版多本旅遊書籍。1997 年出版《愛走就走》，1998 年出版《埃及、約旦、以色列逍遙遊》、《土耳其·希臘精緻深度旅》，1999 年出版《走過非洲大地》、《親子逍遙遊臺灣》，2000 年則出版《長頸鹿，羚羊奔跑的操場：我和兒子在非洲的 discovery 之旅》。透過其作品反映出 1990 年代末期，臺灣社會女性與旅遊的論述中，臺灣女人自助旅行的空間不再僅是「文明」的西歐北美社會，海外旅遊的空間擴大了。旅遊對於這個時代女旅人充滿了誘惑：

我覺得，自助旅行比安非他命的誘惑高太多了，只要輕輕的一接觸，立即上癮。自助旅行其實是不分族群、性別、年齡、宗教和語言的，套上「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那句廣告詞就對了。（丘引，1997 年 7 月 11 日）

然而，身為人女、人妻與人母，海外自助旅行對於女性而言的風險論述仍然存在於

1990年代的臺灣社會，丘引在訪談中提及，在旅行啟程前，她往往不與親長、朋友分享旅遊計畫，產製出面對前述風險論述以及可能形成的阻礙的策略：

（第一次自助旅行家人知道嗎？）他們都不知道啊！當然。台灣這麼保守怎麼能說，我父母這麼保守，一說了，你就不可能，就出不去。台灣的父母，很多話你都跟父母不能說的。（丘引訪談，2015年4月15日，台北市）

我覺得就是做自己，很奇怪我從小就要做自己，所以我跟我媽衝突很大。我媽非常非常保守，我就是從小就是要做自己，然後從小我就知道我是誰，我要走我的路。我很堅持，那些障礙，只要有障礙的我都把它踢掉、踢掉、踢掉。如果你一直在跟我囉嗦，我就不會跟你講。（丘引訪談，2015年4月15日，台北市）

我通常不太會跟朋友講，等到書出版。（朋友會說）這樣啊，妳怎麼可以這樣。因為她們有太多阻力，不要別人成為我生命的阻力，我又沒有害別人，我是走我自己的路。（丘引訪談，2015年4月15日，台北市）

訪談的過程中，丘引談到在異性戀的婚姻關係與母職中，作為一個「不安於室」的女旅人，她發展出各種協商的策略：

我有孩子都自己帶，我很外向，每天都想往外跑，我就覺得我照顧一個 baby 是很痛苦的事情，好像變成要弱智了。（丘引訪談，2015年4月15日，台北市）

他爸爸本來是要反對（我自己去旅行），但是他又要維持男性的尊嚴，因為反對就表示你不够民主，我們已經說好了要民主，婚姻要民主。所以他不敢反對，那他就用說：「要去旅行，那你得把孩子帶去」，帶就帶，怕甚麼？錢拿來，就是說因為我講好了。我出我自己的錢，他需要出孩子的旅費。因為我在照顧孩子嘛，所以我也出這一部份的錢，你要出另外那部份，就這樣，帶就帶，怕甚麼。（丘引訪談，2015年4月15日，台北市）

他們說我是出門一條龍，回家就一條蟲，我都告訴我家人只要我出門一切都 ok 的，所以都不用報。I am ok. I am an independent person. Why you want to worry about me? 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那既然是你的問題，幹嘛我要花錢去打這個電話給你，然後我還得掛心我得打電話。（那如果是家人想念你呢？）你幹嘛想我？如果要想我，平常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對我好一點就好了。當我去旅行的時候，你就沒有在我心裡了。（丘引訪談，2015年4月15日，台北市）

從受訪者的經驗中可以發現，日常母職對於嚮往「往外跑」是一種挑戰，但在成為母親後，想要自助旅行，必須處理婚姻關係中的制約和母職的期待，所以她發展出「帶孩子旅

行」的策略，並透過強調親職必須由夫妻分擔來獲得孩子的旅費。對於 1990 年代的女旅人而言，旅行是重要的「自由」象徵，是生命創意和潛能的來源。

（旅行的意義）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自由，你的靈魂是自由的，如果靈魂不自由，妳的生命怎麼快樂。旅行就是讓你自由因為沒有設限，妳要什麼都可以，妳不要什麼也都可以。發現妳的潛能，了解自己的弱點。我覺得旅行是一個，我是數學系的，旅行就像微積分的世界，它是 infinite，無窮的嘛。（丘引訪談，2015 年 4 月 15 日，台北市）

在臺灣的女性與旅遊論述中，「豔遇」的討論貫穿了臺灣女性旅遊的歷史。2015 年 4 月 15 日，研究者與丘引的訪談進行前，她在台北的廣播電台錄製節目，在此電台訪問中「女性旅遊者如何面對豔遇」仍然是節目主持人對丘引的提問：

如果你要去接受豔遇，那你就需要有應變的能力，接踵而來的各種事。如果你沒有能力的話你就先停看聽。我覺得「豔遇」沒有壞事，你可以去接受，但是你自己要有處理的能力，你不要到時候又埋怨他拋棄我。我覺得在處理兩性的關係的時候，女性你不是一個被動者，你也不是一個受害者，你不是一個受害者，不要老是用女性是受害者的角度去看事情，去看待自己。（丘引訪談，2015 年 4 月 15 日，台北市）

換言之，旅遊（公共）空間對於女性可能隱藏的危險以及性的誘惑在 1980 年代至 2015 仍然存在於臺灣女性旅遊論述的辯證中。旅遊空間中的「男性凝視」依然是加諸女旅人的力向。最後，由丘引的訪談中可以，1990 年代儘管有越來越多類型的女旅人，女旅人的旅途越來越多元寬廣，臺灣女人嚮往海外旅遊，但「想走不敢走」的自我規訓仍然存在，那些得以突破日常生活結構旅行天下女人，仍然被視為「不是標準女性」。

其實本來也沒有想寫旅行，是因為我一個編劇班的同學一直跟我講說，因為他是留美，他都還不敢像我這樣跑，他就跟我講說「妳都很自私自己玩，妳也不為這麼多女性著想，很多女性也都想走但是都不敢走，像我這樣留美都不敢走」。到現在都還有人說我「妳不是標準的女性」，這個是 positive, not negative。（丘引訪談，2015 年 4 月 15 日，台北市）

然而，對這個階段的女旅人而言，「不是標準的女性」已經不再是負面的質疑批評，而具有正面、賦權的意義。

伍、結論：1980、1990 年代的臺灣女性與（海外）旅遊論述

承前所述，臺灣自 1978 年（民國 67 年）12 月 30 日起開放出國觀光，但性別相關統計直到 1994 年（民國 83 年）交通部觀光局才開始建置，臺灣女人的（量化）旅遊經驗直到 1990 年代才開始受到官方的重視。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透過歷時性資料的蒐集與

質性論述分析，建構一個臺灣女性與（海外）旅行的歷史圖像，論述 1980 年代前後與 1990 年代臺灣女人的（海外）旅行論述與經驗，探究女旅人的旅行實踐與認同。

透過歷史資料的整理與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在大眾媒體的再現中，於 1980 年代前（1970 年代中後期）臺灣尚未正式開放海外觀光之際，旅遊節目已經是臺灣電視台重要的節目文本類型，女性則擔任節目主持人。除了媒體再現的海外旅遊外，這個階段臺灣人日常生活中的旅遊則以「商務考察團」的形式進行，以多天數、多點、多國家的團體海外旅遊形式進行。參與「商務考察團」的女性旅人多半是中產階級以上，家庭擁有經濟資本的中年女性，隨丈夫出國觀光。

1980 年代後，「名女人」的旅遊經驗成為臺灣女性旅遊經驗言說的重要對象。例如 1980 年代女作家三毛旅遊文學作品產生的「三毛熱」即是一例。此外，透過 1980 年代台視《電視周刊》的論述分析，在這個旅遊資源與資訊相對缺乏的時代，女明星、女主播等「名女人」在是臺灣社會瞭解海外觀光的重要窗口。海外旅遊對於臺灣女性的「心靈成長」、「知性」意義在大眾媒體再現過程中持續被生產與構連。然而，在 1980 年代臺灣社會戒嚴前後的歷史氛圍中，「國族主義」的情愫成為媒體再現女旅人時的重要成分。海外旅遊不僅是休閒、娛樂與心靈成長，亦是對內凝聚國族認同、對外宣揚臺灣（中華民國）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樣在 1980 年代，臺灣的（海外）「自助旅行」風氣已然成形，平面媒體刊載「自助旅行樂系列專文」，海外自助旅行不再僅是中高齡「有錢」男性或夫妻的專利，女性作為自助旅行的主要行動者在 1980 年代初期已經確立。這些女性旅人可能是未婚的「單身貴族」也可是「職業婦女」。換言之，當代西方論述中休閒得以使女性衝破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的賦權力量在 1980 年代臺灣的女性旅遊媒體論述中已經成形，但協商、妥協的實踐與認同模式仍然存在，海外旅遊的空間仍然被媒體報導、旅人經驗分享與「女性出國須知」等文本大量再現為對女性充滿隱藏危機的公共空間，女旅人仍然被再現為被凝視的客體，對於女旅人身體與性的規訓與期待仍然透過個體自我監視的過程來完成，甚至成為女性海外旅遊的阻礙。

1987 年臺灣解嚴後，邁入 1990 年代，女旅人的媒體再現隨著雨後春筍般的旅遊節目而逐漸多元發展。這個階段（海外）旅行具有重要的「社會教育意義」，如「繞著地球跑」等節目，再現出知性、都會、高學歷與女性化的女旅人形象，但相較於 1980 年代，冒險犯難、膽大包天的女旅人形象開始出現在銀幕上，閱聽人對於銀幕女旅人的旅遊地點不再是主流的歐洲、北美觀光地區，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蠻荒、難以抵達的景點。然而，傳統的性別二元論述依舊存在，女性的身體和女性氣質依舊和旅行有所扞格，因此，這樣的一個女性旅者，必然是「另類女人」甚或「不像個女人」的「另一種人類」。女旅人的銀幕形象與家庭、母職存在者強烈的扞格。整體而言，1990 年代臺灣銀幕女旅人的角色、旅行的身體與旅行的空間雖然更為擴展，擁有更多的可能性，挑戰了傳統的性別氣質與規範。但「理想」的女旅人/主持人期待仍然加諸在她們身上，各種順服、妥協與折衷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在臺灣女人的日常（海外）旅行的實踐與認同模式中，海外（自助）旅行已成為 1990 年代臺灣女性新的自我性別期待與規範，婚姻、家庭與事業未必是成就感的來源，（海外）旅行被視為中產階級女性重要的成就感符號，是勇氣與心靈成長的重要實踐。在海外旅行的女人，

也被一般女性視為重要的典範與「啟示」來源。旅遊文學書寫 1980 年代及 1980 年代以前僅屬於少數女性作家、名女人，1990 年代末期，旅遊經驗的書寫已經變得普及，甚至被視為一種「全民運動」，為 2000 年代以後網際網路發展下的「眾聲喧嘩」起步。

整體而言，1980 年代，臺灣女人的旅行論述仍陷入傳統性別二元對立的邏輯中。「旅行」與知性、理性、體力構連，女性的旅行者普遍被再現為體力弱、不理性、充滿夢幻憧憬、不切實際的缺乏主體性的旅行者。1990 年代，主流媒體中出現了充滿知性的女性旅行者與旅遊指導者。然而，「男主外、女主內」的二元邏輯依舊作祟，「另類女人」依舊伴隨著活躍的女旅行者圖像。隨著「女遊」論述的變遷，旅行中的女人身體論述也發生的轉變。1980 年代，女體被視為虛弱、麻煩、隨時處在風險之中因而需要在旅行中特別「處置」的身體。在這個階段，身體被視為女人旅行的桎梏。到了 90 年代，「女體」在旅行論述中的能動性大增，女人的身體也可以穿梭蠻荒叢林、挑戰極限運動、品嚐奇珍異食，但女體論述仍受到「宜」端莊、知性的型塑；2000 年後，旅行的女體變得更加多元，呈現的樣貌各異。然而，在主流媒體的旅遊論述再現中，女體依舊符合了特定的審美標準。年老的、肥胖的、身心障礙、貧窮的女性旅者，其身體仍舊失語。

若置放在旅行空間的討論上，1980 年代的海外旅行論述中，異國旅行空間被認為隱含著風險，女人被認為「適合」「文明」的歐洲、美洲等地。1990 年代後，女人旅行的空間開始擴大，荒野異國也得以行走。在這個階段，旅行空間被視為知性知識的來源，行走其中的女性旅者，乃是勇氣與知性的化身。最後，「女遊」空間被視為休閒、愉悅與建立認同的場域，深具性別賦權的意義。然而，伴隨著資本主義的開展，女性旅遊受到消費文化的刺激與形塑，不能過度樂觀的視其為全然的解放與賦權，而要更細緻聆聽不同女人的聲音。

陸、旅行＝解放？展望遊記、消費與敘事的 2000 年代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歷年國人出國按性別分析」統計資料顯示，1980 年代末期，台灣每年女性出國人次達到約 135 萬人次；歷經 10 年，到了 1990 年代末，每年女性出國人次已經超過 275 萬人次；根據 2009 年的統計，台灣女性每年出國的人次已經超過 350 萬人次。當女性出國旅遊的風氣日盛，主流媒體中所呈現的女性旅行者形象日眾。以女性擔任第一線外景/節目主持人的海外/國內旅遊節目也隨著有線電視頻道眾多而增加，出現如《世界那麼大》（原《中國那麼大》）、《台灣尚青》、《世界正美麗》等以女性為節目主持人或主要製作團隊的旅遊節目。在此階段，女性的旅行者不僅是知性、正襟危坐的角色，旅遊的內容、形式、身體與空間均有了較多元的呈現方式。此外，此階段的旅遊節目多結合網際網路，除了節目官方網站外，主持人的部落格也是節目經營的重點，圖文遊記的網路呈現受到重視。換言之，隨著網際網路以及各種攝影、傳播工具的進展，台灣女人旅行經驗的言說進入了多媒體的時代。

網際網路空間中的圖文「遊記」成為女性書寫旅行經驗的重要空間。許多台灣女性會在部落格、無名小站、臉書（facebook）等各種個人網路平台中，進行旅行經驗的書寫，從旅

行事前規劃、旅遊行程均有風格各異的書寫。其中「消費經驗」也受到重視，時常是遊記言說的重點，許多受歡迎的「素人」部落客也因此成為旅遊產業「薦證式代言」的代言人，旅遊經驗與書寫與消費緊密扣連。女人旅行與旅行書寫已經不再被旅遊節目主持人、作家獨享，而進入眾聲喧嘩的階段。在此同時，海外旅行的「休閒/充電」意義也得以開展，旅行不僅是「知性」的，也可以是愉悅、認同的來源，為必須要是不理性與節制的。至此，台灣女人的旅行進入了多元意義與認同的時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女性的旅遊經驗受到重視，但主流媒體中出現的女性旅行者多半仍符合主流異性戀媒體的審美標準，女體在旅行中享受能動中，但仍受到偏差的再現。此外，「年輕」仍是主流媒體論述中主要再現的女性旅行者形象，母親、年老的女人的旅行實踐與詮釋依舊失語。

最後，本文之研究限制部分。本研究乃是透過論述分析，試圖勾勒出近 30 年的台灣女性旅遊論述變遷並分析其性別意涵。然而，台灣女人的旅遊體驗與認同絕非同質，若意欲進一步分析其中差異的生命經驗與性別意義，未來研究應針對女人的旅遊體驗進行更深入且細緻的探索與分析。此外，女人本身亦非同質的「鐵板一塊」，當女人處在不同的社會位置、擁有不同的身體，其旅行的論述、實踐與認同將呈現多元的樣貌與不同的性別意涵，這亦是未來研究必須深化之處。

參考文獻

- 九女結伴，逍遙自助旅行，(1985 年 12 月 31 日)。民生報，第 10 版。
- 女性自助旅行的觀念問題，(1988 年 7 月 11 日)。民生報，第 7 版。
- 于模珉 (1990 年 7 月 24 日)。女人自助旅行勇者，中國時報，30 版。(家庭)
- 戶外生活雜誌觀光叢書編輯組編著 (1987)。女性出國須知。臺北：戶外生活。
- (1979 年 7 月 29 日)。〈太好玩了！值得！值得！姜鳳書、陳瑋齡參加東南亞旅遊歸來〉，《電視周刊》，877:46-49。
- 華視綜合週刊 (1988 年 11 月 13 日)。台視側訪，華視綜合週刊，890：50-53。
- 王天威 (2004)。臺北縣青少年女性休閒運動參與狀況與阻礙因素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王志弘、許妍飛 (譯) (2006)。社會認同。臺北：巨流。(Jenkins, R., 1996)
- 王寬蓉 (2006)。女性旅遊體驗之探索研究。南華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方淑儀 (2005)。國小女性教師國外自助旅行之體驗學習。國立師範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丘引 (1997 年 7 月 11 日)。愛走就走 who 怕 who。中國時報，第 42 版。
- 丘引 (1997)。愛走就走。台北市：女書文化出版。)
- 丘引 (1998a)。埃及、約旦、以色列逍遙遊。台北市：大地地理出版。
- 丘引 (1998b)。土耳其. 希臘精緻深度旅。台北市：培根文化。
- 丘引 (1999a)。走過非洲大地。臺北縣永和市：稻田。
- 丘引 (1999b)。親子逍遙遊臺灣。台北市：張老師。

- 丘引 (2000)。長頸鹿, 羚羊奔跑的操場: 我和兒子在非洲的 discovery 之旅。台北市: 方智。
- 李雅情 (2008)。徐鍾珮 鍾梅音遊記散文研究。東海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李秀媛 (1995)。繞著地球跑: 李秀媛冒險書。臺北: 皇冠。
- 李淑菁 (1997)。自助旅行, 價值無限。旅訊, 70: 4-7。
- 牟迎馨 (1998年10月31日)。不安於室的女人, 民生報, 第18版。
- 何琬琦 (2007)。臺灣女性與旅遊的對話——臺灣女遊書寫研究 (1949~2007)。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沈玫 (1984年4月15日)。〈鄧麗君不急著把自己嫁出去〉, 《電視周刊》, 1123:80-82。
- 林玫君 (2006)。從探險到休閒: 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臺北: 博揚文化。
- 林瓊玉 (2009)。不同職類女性參與休閒活動類型及休閒阻礙因素之探討。大葉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周雅玲 (1997)。當代臺灣文學中關於女性空間之研究--以女作家之小說為例。中原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周羽 (1990年3月16日)。上班女子愛出國。中國時報, 30版。
- 林倬立 (2004)。當旅行成為工作-女領隊的空間流動經驗與轉變。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 林佑甄 (2000)。文學以外的旅遊, 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第54期, 頁8-12。
- 林秋嫻 (2000)。扭轉乾坤。臺北: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
- 林姬瑩 (1999)。踩著夢想前進。臺北市: 大田出版社
- 林姬瑩 (2000)。女性與旅行, 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第54期, 頁1-4。
- 林宇玲 (2007)。偏遠地區學童的電玩實踐與性別建構-以臺北縣烏來地區某國小年級學童為例, 新聞學研究, 90, 頁43-99。
- 林怡君 (1998年12月19日)。父權社會下永遠的遊客。中央日報, 第23版。(大千世界) 追尋旅行者的蹤跡 (中)
- 怡寧 (1980年9月14日)。〈楊雅卉要樹立她的新形象〉, 《電視周刊》, 936:78-81。
- 周嘉川 (1979)。歐美采風錄。台北市: 臺視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 洪世民 (譯) (2009)。襯裙、驛馬車愛冒險的女人-女人旅行300年紀事。臺北: 山岳文化圖書有限公司。(Hodgson, B. 2002)
- 姜穎 (2013)。多重邊緣裡的宰制與賦權: 臺灣的性別、運動與國族。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未出版博士論文。
- 胡幼慧 (1996)。質性研究: 理論、方法以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市: 巨流。
- 袁世忠 (2006年12月4日)。卸下主持棒 柯志恩攻博士靠哭功。自由電子報, 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05122>
- 唐筱雯 (2009)。性別逾越的實踐?-女性自助旅行經驗分析。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 孫蓀媛 (1991)。我在尼斯遇到趙耀東。旅訊, 1: 73-76。
- 梁春月 (2009)。女性休閒運動自我效能、休閒動機、休閒阻礙與休閒涉入之關係研究—以

- 高雄市參加有氧舞蹈休閒運動課程之學員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未出版博士論文。
- 梁旅珠 (2010)。開向自由與狂野的一扇窗。台大校友雙月刊, 72: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p=10021>
- 常言(1980年6月29日)。〈「百花宮主」張琍敏歐洲行(三)〉,《電視周刊》, 925:78-81。
- 常言(1983年12月11日)。〈沈春華驛馬星動?〉,《電視周刊》, 1105:92-94。
- 探險式自助旅行有意思,(1985年9月8日)。民生報,第4版。
- 陳子軒(2013)。邁向批判運動社會學/身體文化研究。體育學報,45(4), 267-278。
- 陳柔縉(2005)。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市:麥田。
- 陳怡玲(2007)。美濃南洋臺灣姊妹會新移民女性休閒生活研究。逢甲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陳室如(2007)。文為心聲—現代散文評論集。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
- 陳芳明(2011)。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市,麥田
- 陳素雲(1991)。單身女子自助旅行實況:從尼泊爾玩到峇里島。旅訊: 5: 49-63。
- 陸晴/旅遊作家(1997年7月11日)。想出國旅行得先問男朋友?中國時報,第42版。
- 許茹菁(2000)。掙扎與圖---女性 / 旅行 / 書寫。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未出版碩士論文。
- 游鑑明(2000)。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33, 1-75。
- 游鑑明(2011)。走出自我:民國百年婦女四部曲。載於章英華等(主編), 中華民國發展史-社會發展(上冊)(頁275-307)。臺北市:政治大學、聯經出版公司。
- 黃宜萍(2002)。徘徊在社會體制的十字路口,18名女性運動員運動社會化與身份認同的研究。東華大學觀光暨休憩管理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 黃志暉(2008)。新竹縣市客家女性參與休閒活動對生活型態與健康概念影響之研究。樹德科技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黃淑珍(2000)。TRIZ理論應用於女性休閒運動機能服飾設計之研究。嶺東科技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黃恩慈(2006)。女子有行—論施叔青、鍾文音女遊書寫中的旅行結構。國立成功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黃千芳(2003)。維吉妮亞·吳爾芙《出航》與《奧蘭朵》中的女性旅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黃安勝(1985年9月8日)。有組織傳播自助旅行經驗,走萬里路應重行前武裝。民生報,第4版。
- 黃安勝(1985年9月27日)。徐蓓單槍匹馬週遊列國。民生報,第4版。
- 黃安勝(1985年9月30日)。張玉妹老師暑假遍遊歐美。民生報,第4版。
- 黃彩娟(1988年3月9日)。杜淑瑛精心安排帶小孩暢遊歐洲。民生報,第4版。
- 張曉琪(2007)。女性休閒消費者消費特性、休閒涉入與購物體驗之研究。大葉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張靜雯(1982)。女性出國觀光指南。戶外生活雜誌觀光叢書。
- 張嘉倫、吳學銘(1999年3月7日)。女人當家,一樣出色:四位駐華觀光單位女主管細說她們成功的故事。民生報,第18版。

- 張琇鳳 (1991)。心動不如行動。旅訊，5: 62-63。
- 張必瑜 (1994年11月31日)。脫衣驗身打通關？，聯合報，第39版。
- 程芬華 (1999)。「困頓?重生?」-三色堇綻放的故事。國立台東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單身女郎怎麼遊，李樂詩舉實例，(1988年7月11日)。民生報，第7版。
- 曾煥玫 (2000)。女性自助旅行者的旅行經驗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曾君佩 (1998)。逾越愉悅的身體政治-女子三溫暖的女性休閒經驗與空間意義。國立臺灣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曾煥玫 (1999)。女性自助旅行者的旅行經驗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 曾雅玲 (1991)。旅行的感覺真好。旅訊，5: 64-65
- (1980年6月)。〈方晴主持大螢幕更上層樓〉，《電視周刊》，924:50-51。
- 楊芳枝 (2000)。離「家」出「遊」：論旅行的性別政治，*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54期，頁5-7。
- 廖輝英 (1990年10月5日)。寵她就讓她旅行，中國時報，第30版。(家庭)
- 廖俊逞、朱安如 (2011)。創作，在路上—旅行中的人生風景 王偉忠 vs. 賴聲川。PAR 表演藝術，128，網址：<http://par.npac-ntch.org/article/show/1346406718666533>。
- 寧怡 (1981年7月)。〈驛馬星頻動 學習心特強 胡茵夢要去美國充點電〉，《電視周刊》，1981:78-79。
- 趙惠群 (1994年2月2日)。現代女性自助旅行小心桃色誘惑。中國時報，第29版。
- 萬水千山任我行，自助旅行女孩迷，(1985年12月1日)。民生報，第4版。(戶外活動新聞版)
- 夢非(1984年1月8日)。〈「天涯若比鄰」拓展國內觀眾視野〉，《電視周刊》，1109:66-67。
- (1979年7月8日)。〈歐洲歸來 張琍敏重新肯定自我〉，《電視周刊》，874:44-49。
- 駱凡(1983年12月4日)。〈徐貴櫻出國小遊再擬長程計畫〉，《電視周刊》，1104:144-145。
- 「她想出去走走散散心」
- 劉雲英 (1988年3月25日)。冒險不危險：單身女行自助旅行安全守則。聯合報，第13版。(家庭與婦女)
- 劉耳、季斌、馬嵐譯，(2000)。女性休閒—女性主義的視角。中國：雲南人民出版社。
- (Henderson, K., 1996)
- 劉佩佩 (1998)。未婚女性休閒生活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劉北成、楊遠嬰 (譯) (1999)。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Foucault, M., 1975)
- 劉愛貞 (1997年1月15日)。在下午茶中，想念旅行。中國時報，第31版。
- 劉春英 (1991)。自助旅行會上癮。旅訊，5: 68-69。
- 劉愛貞 (1997年1月15日)。在下午茶中，想念旅行。中國時報，第31版。
- 應蕙芬 (2007)。《90年代以降臺灣旅遊現象文化意涵之探討。靜宜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蔡禎雄 (1995)。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市：師大書苑。
- 薛茜蓉 (2006)。臺北市旅行業未婚女性休閒類型對心理健康之影響。國立臺北護理學院未出版碩士論文。
- 闕菊慧 (2007)。新移民女性休閒行為之探究—以嘉義縣梅山鄉安靖國小之越南女性為例。

- 南華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韓華 (1997年7月27日)。旅行，讓女人愈來愈勇敢，中國時報，34版。
- 簡時福 (2006)。更年期症候群對女性休閒活動參與影響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未出版碩士論文。
- 藍朵 (1998年5月30日)。劉大絹環遊世界追逐夢 帶回娃娃好回憶，民生報，第32版。
- 譚惠文 (2007)。臺灣當代女性旅行散文研究。東吳大學未出版博士論文。
- 蘇碩斌 (2011)。休閒、運動與觀光，載於章應華等著，*中華民國發展史-社會發展* (下冊)，頁621-653。
- 蘇瑛敏 (1998)。女性休閒環境架構之基礎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未出版博士論文
- Andrews, H. (2005, September). Gendered spaces of tourism: Examples from Mallor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Annual Conference, London
- Aitchison, C. (1999). New Cultural Geographies: The spatiality of leisur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Page, S. & Connell, J. (Eds.), *Leisure Studies*, Volume 1. UK: Routledge
- Aitchison, C. (2004). From policy to plac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of gender-leisure relations in everyday life. In Mitchell, W. & Bunton, R. & Green, E. (Eds.), *Young People, Risk and Leisu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Aitchison, C. (2003). *Gender and Leisur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UK: Routledge
- Bhabha H. (1991). The Third Space: Interview with Homi K Bhabha. In Rutherford J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207–21. London, UK: Lawrence & Wishart,
- Bairner, A. (2012).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9, 102-117.
- Bourdieu, P. (1987).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nch, C. (1985). *Bringing the global home*. Denver, CO: Antelope Publications.
- Bunton, R. & Crawshaw, P. & Green, E. (2004). Risk, Gender and Youthful Bodies. In Mitchell, W. & Bunton, R. & Green, E. (Eds.), *Young People, Risk and Leisu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Carpenter, G. (1985). The leisure feminist link. *Leisure Information Quarterly*, 12(3), 5-6.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 Cohen, E. (1979). A Phenomen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s. *Sociology*, 13(2): 179-201
- Cross, G. (1990). *A Social History of Leisure Since 1600*. UK: Venture
- Cronan, M. K. & Scott, D. (2008). Triathlon and woman's Narratives of bodies and sport. *Leisure Sciences*, 30, 17-34
- Crouch, D. (2000). Places around us: embodied lay geographies in leisure and tourism. *Leisure Studies*, 19, 63-76
- Deem, R. (1982). Women, Leisure and inequality. *Leisure Studies*, 1, 29-46
- Enloe, C.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UK: Pandora Press.

- Fullagar, S. (2002). Narratives of Travel: desire and the movement of feminine subjectivity. *Leisure Studies*, 21, 57-74
- Green, E., Hebron, S. and Woodward, D. (1990). *Women's Leisure, What Leisure?* Basingstoke, UK : Macmillan.
- Green, E. & Seabrook, T. (2004). Streetwise or safe? Girls Negotiating Time and Space. In Mitchell, W. & Bunton, R. & Green, E. (Eds.), *Young People, Risk and Leisu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Grosz, E. A.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PA: Indiana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 & Machung,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NY: Viking
- Jeffreys, S. (2003). Sex tourism: do women do it too? *Leisure Studies*, 22, 223-238
- Jordan, F. & Aitchison, C. (2008). Tourism and the sexualisation of the gaze: solo female tourist' experiences of gendered power, surveillance and embodiment. *Leisure Studies*, 27(3), 329-349.
- Johns, M. (2004). Putting the history into sport: on sport history and sport studies in the UK.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13(2), 145-160.
- McDowell, L. (1993). Space, place and gender relations: 2. identity, difference, feminist geometries and geograph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7(3): 305-318.
- Peiss, K. (1986). *Cheap amusement: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Pritchard, A. (2001). Tourism and representation: a scale for measuring gendered portrayals. *Leisures Studies*, 20, 79-94
- Rojek, C. (2000). *Leisure and culture*. UK: Macmillan Press
- Shannon, C. & Shaw, S. M. (2008). Mothers and Daughter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Leisure. *Leisure Sciences*, 30, 1-16
- Shaw, S. M. (1985). The meaning of leisure in everyday life. *Leisure Sciences*, 7, 1-24.
- Scruton, S. & Watson, B. (1998). Gendered cities: Women and public leisure space in the 'postmodern city'. In Page, S. & Connell, J. (Eds.), *Leisure Studies*, Volume 2. UK: Routledge
- Smith, B. & Caddick, N. (2012). Qualitative methods in sport: a concise overview for guiding social scientific sport research.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Science*, 1(1), 59-73.
- Thomas, M. (2005). What happens in Tenerife stays in Tenerife: Understanding women's sexual behavior on holiday.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7(6), 571-584.
- Tsai, Chiung-Tzu L. (2006).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Women's Leisure in Taiwan. *Leisure Studies*, 25(4): 469-476.
-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ondon, UK: Sage.
- Wearing, B. (1998). *Leisure and feminist theory*. Melbourne, Australia: Longman
- Wynne, D. (1998). *Leisure, lifestyle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UK: Routledge
- Young, I. M. (2005).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如已有嚴重損及公共利益之發現，請簡述可能損及之相關程度（以 500 字為限）

一、 學術成就與學術價值部分

整體而言，本研究乃是企圖超越透過官方統計數字僅能提供量化的臺灣女人的旅遊經驗變遷趨勢的侷限，建立一個質性典範的論述，描述「女人的旅行，旅行的女人」在臺灣社會的 1980、1990（這兩個階段是臺灣海外旅遊初興、卻甚少被言說、記錄的年代）年代的詮釋與實踐內涵。學術成就方面，本研究在既有休閒研究論述中是少數歷時性的研究，大量整理了 1980 與 1990 年代的平面媒體（報紙）並透過電視週刊的紀錄，再現出當時的電子媒體文本，在文獻的蒐集上更為擴展。勾勒出 1980 年代前後臺灣社會特殊氛圍之下的女性旅遊再現與實踐以及 1990 年代社會風氣劇烈轉型下的變遷。其次，本研究亦採取批判式的論述分析，在析論 1980、1990 兩個十年的臺灣女性（海外）旅遊媒體再現以及女旅人實踐的過程中，透過批判式、（休閒）社會學的立場，將蘊含在其中的性別與國族主義等意識形態力量勾勒出來，在批判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其三，研究方便層面，本文在研究不同階段彈性使用多種研究方法，非純然的文本、論述分析，本研究不僅聚焦媒體再現過程中刻畫的「集體記憶」以及權力關係，亦透過（重要）女旅人的深度訪談，將 1980、1990 年代重要女性旅人的旅遊實踐、詮釋與認同紀錄下來，透過與文本的辯證，在結構與能動間進行多元的想像。整體而言，學術成就方面，本研究對於開創運動休閒場域的性別論述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價值，亦是開啟性別的、批判的運動休閒社會學在地（臺灣）論述的起步性研究。因此，本研究計畫將完成之研究成果投稿至國內運動休閒期刊（如大專體育，tssci 期刊以及社會學期刊（如臺灣社會學刊，tssci 期刊），已深化運動（休閒）社會學與主流社會學界對話的能動性。

二、 社會影響（兼論本研究之學術與應用價值）部分

基於主流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典範以及產學合作的主流期待與分工模式，本研究為少見的運動休閒社會學立場批判論述，將提供產業界、社會實際應用層面在改善與促進運動休閒（旅遊）性別平等意義。本研究在撰寫過程中，研究者亦完成了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刊物《臺北體育》第 21 期（2015 年 8 月出版）中之專題報導「從體育促進妳/你我的性別友善城市」五千字專文，論述運動、休閒在城市中的性別意義。研究者亦規劃將研究成果投稿國內觀光休閒期刊，期望能提供運動、休閒社會學批判、性別立場的論述，提供相關產業性別平等企業管理、商品與服務的發想與日常實踐。

2014QRSE 研討會口頭發表情形

姓名	姜穎	單位	休閒遊憩管理系	職稱	助理教授
研討會名稱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and Exercise		研討會期間	自 103 年 9 月 1 日 至 103 年 9 月 3 日止	

研討會心得報告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and Exercise (國際質性運動身體研究研討會)為西歐新興且重要之國際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在英國運動研究重鎮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舉行，本次研討會共有 19 場次主題口頭發表，計有近百位研究者發表。與會者來自英國各地、德國、瑞典、澳洲、美國、加拿大，亞洲地區僅有一位日本學者及兩位台灣學者（包含本人）與會，於研討會中發表有關東亞地區運動研究場域之質性研究成果。

本次研討會所涉及之研究領域甚為廣泛，包含體育、運動心理學、運動社會學、運動哲學、適應體育/運動等。研討會計有 4 場 Keynote presentation，如多倫多大學 Michael Atkinson 教授，其近年由運動社會學轉往投注於運動人類學場域，本次專題演講透過其長達年餘的參與觀察與 emic 主位的研究立場，揭露一個運動研究場域中質性典範「往人類學轉」的趨勢。這也可以在口頭發表的多篇論文中，發現體育、運動心理學乃至適應體育的人類學發展趨勢。呈現超越量化實證主義思維，多元方法論彈性施用的豐富成果。

本人之研究於 9 月 2 日上午 Gendered Bodies 場次中發表，共有 5 位運動性別研究者參與。主題包含男性研究、媒體性別再現、運動身體等主題，由來自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Glasgow 以及澳洲 University of Tasmania 的研究者發表。並由近年投入於酷兒與運動之 Dr. Jayne Caudwell 擔任主持人。與會者對於台灣運動研究場域性別發展趨勢表示興趣。

透過本次研討會之參與，得以瞭解質性典範在國際運動/體育研究場域的發展趨勢與前瞻性，顯示在國內尚屬新興或是仍受實證主義制約之質性研究仍有發展空間與可能性。另外，本次研討會之餘，本人也與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重要國際運動社會學者 Alan Bairner 進行兩次會面，針對近期研究成果與其分享與請益。Bairner 教授與台灣運動社會學界有長遠合作關係，我們相約明年於台灣舉行之台灣國際運動社會學年會再度相見。

此外，本人亦利用研討會之餘時間，進行英國包括 Chelsea FC、West Ham United 兩個足球俱樂部的球賽參訪，並前往 Stamford Bridge 進行 stadium tour 的參訪，對於理解英國倫敦運動觀賞與運動旅遊行銷收穫甚豐，對於反思本人科技部專題研究亦甚有助益。

QRS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Taiwanese female athletes Under Martial Law

Ying Chiang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bstract

In the arguments of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Western culture, women were mostly seen as a figure trapped in a marginalized position vis-à-vis men. However, as a product of modernity, modern sport was, bearde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ulture. It is important for non-western researchers to contrast their localized and gendered discourses on the same issue with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Recently,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scholars proposed to view social issues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nativ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this essay, I adopt this perspective to elaborated the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sport’ in Taiwan during the enforcement of Martial Law (1949~1987).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 a microcosm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East Asia. It is a history not just wrought within intra-regional countries but also significant Euro-American powers. A contextual, gendered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s of sports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The aim of this essay is to achieve a localized methodological turn of gender in sport sociology. In doing so, multiple genres of texts, including newspaper, TV programs, governmental publications and speeches of the then-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were collect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as adopted in attempt to build the contour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women and sport in Taiwanese society. Biographies and interviews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male athletes in Taiwanese history, Chi Cheng, were also included.

Key words: sociology of sport, feminism, representation

QRS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Taiwanese female athletes Under Martial Law

Ying Chiang

Chihle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Abstract

In the arguments of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Western culture, women were mostly seen as a figure trapped in a marginalized position vis-à-vis men. However, as a product of modernity, modern sport was, bearde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ulture. It is important for non-western researchers to contrast their localized and gendered discourses on the same issue with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Recently,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scholars proposed to view social issues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nativ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this essay, I adopt this perspective to elaborat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sport' in Taiwan during the enforcement of Martial Law (1949~1987).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 a microcosm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East Asia. It is a history not just wrought within intra-regional countries but also significant Euro-American powers. A contextual, gendered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s of sports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The aim of this essay is to achieve a localized methodological turn of gender in sport sociology. In doing so, multiple genres of texts, including newspaper, TV programs, governmental publications and speeches of the then-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were collect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as adopted in attempt to build the contour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women and sport in Taiwanese society. Biographies and interviews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male athletes in Taiwanese history, Chi Cheng, were also included.

Key words: sociology of sport, feminism, representation

Introduction

Few human qualities are important in relation to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port than memory. (Bairner, 2012: 108)

“Memory” is taken as the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central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formations (Huyssen, 2003; Bairner, 2012; Chen, 2012). Modern sport, as a product of Western modernity, is symbols of civilization and humiliation in the same time for many non-Western societies. However, “sport” is not a homogenized concept; it’s a highly contingent and contextualized practice.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of sport is important for non-Western researchers to build localized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in their cultural systems (Chen, 2012, Chiang, 2013).

Furthermore, modern sport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value system of western middle-and upper- class men, making it a masculinity-validation experience (Messner, 1987 ; Maguire et al, 2002). Contemporary conceptions of manliness and sportsmanship emerged from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 of late-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and specifically Great Britain (Pronger, 1990). Critical and gendered introspection of the sport culture is important for non-Western sport sociologists. Buildi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the way to achieve this reflection. Tang (2009b: 323) claimed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Western modernit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should 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As Hargreaves (1990: 339) pointed out “the history of women’s sport can provid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s and cause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in sport, and of the nature of resistance to change and struggle for change”.

Modern Taiwan, based on its belated modernity and a multi-colonized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sport is different from most Western societies. Nationalism is the undertone of the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of sport in Taiwan (Chiang, 2013). It’s impossible to capture the concept of sport in Taiwan withou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m and vice versa. In Western societies, sport and nationalism has typically sprung from masculinised memory, masculinised humiliation and masculinised hope (Enloe, 1989; Benton, 1998). Women were trapped in a marginal position in sport field. However,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 of Taiwanese sport nationalism creates empowerment opportunities for female athletes. The history of Taiwan sport nationalism will be incomplete without the story of female athletes. In sum, this article is focus o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women and sport during the martial law era (1946~1973). As Ann Hall (1985: 38) points out, sport is an ideological institution with enormous symbolic significance that

contributes to and perpetuates cultural hegemony. All the imagin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sport, sportswomen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and identity of female athletes reveal the ideological domination and possible empowerment. In doing so, multiple genres of texts, including newspaper, TV programs, governmental publications and speeches of the then-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were collect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as adopted in attempt to build the contour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women and sport in Taiwanese society in this historical era.

Taking an Asian methodologically turn: building Taiwan perspective

In the 1980s, Taiwanese social scientists started to advocate “the Chineselization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Yang & Wen, 1982). However, “ask our own question” it’s a perpetual self-reflection in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field of Taiwan. **Ying-zhen Chen** (1997) claims that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inclined to take Western (especially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 as their theoretic position. It caused by the anti-communism in the 1950s. Criticizing American used to be tabooed. In this context, academic fields of Taiwan are lack of the ability, knowledge and intention of American neocolonialism criticism. Besides, United States is the symbol of strong, civilized and progressive for most Taiwanese. “Best students study abroad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popular belief in Taiwan society and academic fields.

In 2004, Taiwanese sociologist **Kuo-hsien Su** focused on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in Taiwan.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131 local sociologists in Taiwan, 69.5% of these scholars had completed their Ph. D. in America, only 16.8% of them were local PhDs (Su, 2004). As **Qi-zheng Ye** (2003) mentions that “American-trained Ph. D. holders occupy an overwhelming amount” in Taiwan. Su (2004) also finds out that there were only 3.27% of Chinese references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 were cited in their TSSCI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journal articles. Furthermore, there was an unclaimed (sometimes formal) rule that articles accepted by SSCI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journals are more “valuable” than TSSCI journal articles. Su called it an “external enticement” in Taiwan research communities. Thus, many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were replications of Western models lack of local question awareness.

In this circumstances, Taiwanese researchers started to claim “**Taking a Asian methodologically turn**” (Chen, 2006). According to Guang-xing Chen (2006: 6), critical discourses which based on Asian (non-Western) experience may form a new perspective 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questions

will be asked. It's a spiritu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elf-reflection on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us and colonists. It could be brutal and painful, because it's a process of self-criticizing, self-denying and self-rediscovering. In the end, it leads to a dignified, subjective agency. As mentioned above, "ask our own question" is the cor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e process of the academic localization. Chen (2006: 21) claim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take an "emic" position, focusing on local experience. Thus, the question awareness of researches will be "de-imperialization". Claiming to take an Asian methodologically turn, Chen (2006: 23)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of Taiwan experience:

Taiwan is the microcosm of region history. Taiwan was never a closed space but a conseque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ggles of East Asian region history,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mainland China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colonized by Japanes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nfluenced by American hegemon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the shared experience of the regio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 the way to clarify the interrelation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Indeed, the history of Taiwan was a multiple-colonized one.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e dictatorship of KMT declared the martial law which withdrew in 1987 fulfilled the democracy today. In this context, Taiwanese share diverse sometimes even opposing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ort and nationalism just reflect the social significant of this ambivale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sport and nationalism was a highly dynamic history articulated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owers. Thus, it's important for Taiwanese sport sociologists to build an 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 of Taiwan, namely the localization of sport sociology. Ye (2001) argues that a localized research must be "cultural relevant". There are two emancipated meanings of localization; first, it's an expression of emancipation of academic Western-centrism, and it's a critical self-reflection of researchers. In addition, "localization" is not only a methodological practice but also an epistemological task. The "local" theme and object of research are not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localization (Ye, 2001: 121).

Gender matters in sport: the mainstreaming of critical gender discourse in Taiwan

Modern sport a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institution, it helped reproducing and

strengthening traditional gender ideology. However, gender issue was not alway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ociologists and feminists. Sport was used to be taken as a stepchild of sport (Kaplan, 1979: X). Gender issues in sport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sports feminism which emanated mainly from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1970s in response to male dominance in sport and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female sport in sport sociologies (Hargreaves, 1990: 324). According to Hargreaves (1990: 325), there is still a general tendency to focus on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sport, rather than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m.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Taiwan, for most Taiwanese sport researchers “gender” is more a quantitative “variable” than an ideological institution.

Focusing on the sport research field of Taiwan, the two most “major” journal of sport studies, *Sport & Exercise Researc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Journal*, which were listed in TSSCI. In the 132 articles of *Sport & Exercise Research* published during 2012 to the first half of 2014, there were only four articles based on critical gender perspective. During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86 articles collected in *Physical Education Journal*, none of them were feminism related. Thus, building local and gendered sport discourse in Taiwan can be taken as an attempt from multiple margins. It is a highly critical and political action.

What role did Taiwanese women pla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As mentioned above, the nationalism is the undertone of the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of sport in Taiwan. The Taiwanese sport nationalism created empowerment opportunities for female athletes in the histor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life experienc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athletes during the martial law era (1949~1987) when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operated extremely. The aim of this essay is to achieve a localized methodological turn of gender in sport sociology. The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era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port and women are crucial.

Methodology: capture the social memory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mory as a ke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cern in Western societies is a recent cultural phenomena (Huysen, 2003: 11). “Social memory” is taken as the foundation of different modern identities. For non-Western researchers, Taiwanese sociologist Zhi-Jie Tang (2009: 314) claimed that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studies depends on the building of “socialcultural history”. The popular, prevailing, multiple materials should be taken to captur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era which researchers want to understand. Only by analyzing these data can researchers comprehend the common ideas and thoughts of the time. Consequently,

the discussion will be cultural relevant and local.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sport sociology, according to Bairner (2012), “memory” presents interesting ways of extending and broadening the sport sociology research field. Multiple data, such as sport stars autobiographies, should be taken to apprehend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sport and sport-related events in a society. Furthermore, Taiwanese sport sociologist Tzu-hsuan Chen (2013: 273)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ss media texts. Chen claimed that media representations are myths, taken to naturalize history.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sport and important sport events create social memory. It can be twisted or rotated disrupting the consistency of history and memory. Chen (2013, 267) claimed a “mass communicational turn” in sport sociology. He believed that by approaching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with sociology of memory and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on sport/physical culture, Taiwanese researchers will be better equipped to march towar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sport/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 of native perspective.

As we mentioned before, the aim of this essay is to build a localized discussion of gender and sport in Taiwan history. In doing so, media representations were the main texts seized to analyze. Multiple genres of texts were collected in the research, including newspaper, TV programs, governmental publications and speeches of the then-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as adopted in attempt to build the contour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women and sport in Taiwanese society. Biographies and interviews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male athletes in Taiwanese history, Chi Cheng, were also included.

In sum, this article took multipl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texts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Building critical discourse was the main goal of the research. As Yu-ling Lin (2007) mentioned, the “validity” of the research was not the “objectivity” but the ability to capture the ideology and power relation between lines. For researchers,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the type of data were not the main concern.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agents and social structure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ccording to Chen (2013), a “valid” qualitative research might not be “generalized” but the readers should be able to “emphathize”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 it. More critically, Guang-xing Chen (2006: 437) claimed that quantitative paradigm, the belief of “objectivity” was the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 (imperialism). Furthermore, it’s the symbol of Western scientific rationale hegemony. Chen took critical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s a resisistance to it.

The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sport’ in Taiwan during the enforcement of Martial Law (1949~1987).

Freedom for women in sport is visionary, and constraint looks back to the past.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how residual forms of sport for women co-exist with dominant and emergent ones. By looking at the experience of women historically,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male experience and the whole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Hargreaves, 1990: 339)

Both nationalism and sport we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modernity. As the “other” of inheritances, there is a perpetual, collective anxiety of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Chiang, 2014a). According to Chiang (2014a), since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modern sport became a symbol of civilization. It caused both humiliation and proudness. On the other hand,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became a significant means to achieve national goals, build national identity and arouse patriotism. Even today, the hunger for the “glory of Taiwan” and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are still the undertone of the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of sport in the anxious nation.

As the products of Western modernity, modern sport and nationalism were male-preserved field, women are ‘others’ in it (Chiang, 2014b). However, this collective anxiety subver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sport and nationalism. As we mentioned above, modern Taiwan, with its multi-colonized history and its multi-ethnic groups, has a very different ‘national’ story from most western societies. The way that sport is articulated with Taiwanese nationalism is also unique. It creates empowerment opportunities for female athletes. The history of Taiwan sport nationalism will be incomplete without the story of female athletes.

As Hargreaves’s (1990) discourse, by looking at the experience of women historically,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whole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The period of martial law lasted from 19 May 1949 to 15 July 1987 (38 years and 57 days) in Taiwan. It was the crucial historic moment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women and sport in Taiwan society.

Backgrou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i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day in Taiwan. However,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sport/education was military agencies before 1974 (Chiang, 2013). In the beginning of 1950, the KMT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Education Agenda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Mobilization in Suppression of Communist Rebellion”. According to this agenda, “sport is physical education”. Furthermore, the highest goals of PE were “anti-communist” and “national defense” (Liu, 2007).

“Sport/PE save the country” was a firm political conviction that time. According to Shou-bin Su (2011), for Taiwanese, sport/exercise is personal physical training today; however, it was the discipline from the government then. Meanwhile, Taiwanese women no longer bound their foot, exercising to achieve health was also their responsibility as a patriot (You, 2011). In the 1942, then-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made a simulcasted speech for a national anniversary:

I’m deeply worried and shamed on the physical weakness of our people. No matter your age or gender, everyone should exercise then we may clean the stigma as the “sick man of East Asia” becoming a strong and modern country.
(Li, 1976: 8)

According to this speech,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was the symbol of (Western) modernity for the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The national “other” for the regime was Western modernity/imperialism. Women took the same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s men.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was one of the major means to consolidate the patriotism.

This kind of anxiety continued. However, in the 1950’s, instead of Western imperialism,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came the major national other for the government. Thus, anti-communism became the supreme goal of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ization of sport” were the two major co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Chang, 2009). In 1952, “the China Youth Anti-Communist National Salvation Corps (CYACNSC)”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was established.¹ Presently, it became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ody discipline of young Taiwanese, male or female (Hwang, 2010).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ir physical fitness, Taiwanese were divided into “youth”, “soldier”, “warrior”, “hero” and “national rescuer”.

In the 1960’s, “**anti-communis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are still the cores of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of Taiwan. On October 25, 1961, Chiang Kai-shek made a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6th Taiwan Province Games. He called on the people to “defeat the regime of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y used to beat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In the whole 1960’s,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was taken as one of the behavior regulation as a “decent citizen”.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Daily life regulation of citizen” in 1968. It proposed “decent sport”,

¹ On August 28, 1989 the CYC became a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n October 25, 2000, the CYC officially dropped “Anti-Communist” from its official name.

such as ball games, archery, driving, boating, travel, fishing, hunting, boxing, swimming and dance. In the same yea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rted to promote the “sport for all” and “elite sport” in the same time. “Play for the national glory” in international games becam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national sport policy (Su, 2011: 121).

Sports women: no more a “Rou Nu Zi” (weak woman)

As we mentioned above, this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 of Taiwanese sport nationalism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sport. **The CYACNSC** was the major organization of young women’s sport and outdoor activities.

Abandoned the hedonic tradition, these women expressed the specialty of modern women. They joined the camp to strong their mind and body, furthermore they learned how to fight. Everyone of them wants to be a new, modern women. (Taiwan Women's Writing Association, 1965: 311)

In 1953, women were found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Military Summer Camp”. Women who joined in the mountain climbing camp were described as “the glory of women” (Taiwan Women's Writing Association, 1965: 315). Thus, woman who engaged in the camp of CYACNSC was the token of “new women”:

The name of “rou nu zi (weak woman)” was vanished. Trained by the CYACNSC, all these women became responsible, creative patriots. (Taiwan Women's Writing Association, 1965: 317)

According to the texts, the government then was in need of patriotism, “doing sport” became a governmental recognized activity for women in the era. In the sport field, women started to be represented as “heroine” (of the nation). The CYACNSC as the most important physical discipline organization became the major field of women sports. In other words, nationalism was the undertone of the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of sport in Taiwan then. Women were no longer “others” of sport;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do sport.

There were 314,704 people-time joined the CYACNSC summer and winter camp in the first 13 years of the CYACNSC. However, there were only 30% of the participator were women (Taiwan Women's Writing Association, 1965: 311). Men were still the main participator of the CYACNSC.

Furthermore, for the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contested to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For Chiang’s government, “women took the same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s their male peer” was the symbol of gender equality (Taiwan Women's Writing Association, 1965: 2).

The media presentation of sport women

It was the consistent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of Chiang’s government, in the 1930 the 4th National Games, Chiang made a speech expressed the same idea:

In China, we used to have only man sport/physical education. Today, we have many enthusiastic female athletes. It is huge for our Chinese nation. I wish all the women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game today stay healthy, work out regularly to keep fit as men. It is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It will help us to achieve the gender equality. Women are the “mother’s of our nation”, they take great responsibility. (Li, 1976: 5)

In the April 28, 1962, the first wireless TV station, the Taiwan Television (TTV), was 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 was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 The “Television Weekly” was published by TTV since the same year; it covered preliminaries, and reviews of TTV News and TV shows. According to the “Television Weekly”, women were target audience of sport show. Women audiences were represented as “enjoy working out” (*Television Weekly*, 8: 30, December 3rd, 1962) and “enthusiastic baseball fan” (*Television Weekly*, 12: 6, December 31, 1962).

Meanwhile, women were also represented as athletes, such as ice-skater (*Television Weekly*, 31: 14, May 13, 1963) or female motorcycle rider who claimed “motorcycling was good for health” (*Television Weekly*, 158: 29, October 18, 1965); young female gymnast introduced gymnastics in television shows (*Television Weekly*, 39: 42, July 8, 1963). In the 1965, the show “Today Sports”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football in Hong Kong to the Taiwanese:

Women football is new in Taiwan. However, Hong Kong was also started last year. There are nine teams in Hong Kong now. The idea of “women playing football” was against by many sports people. They used to believe that women were too weak to kick. Furthermore, football was too “barbarian” for graceful young lady. (*Television Weekly*, 163: 47, November 22, 1965)

In the most sport and nationalism discussions, “baseball” was taken as the “national pastime” of Taiwan (Morris, 2011; Chen, 2007). However, in the 1950’s women basketball was the other most important sport practice of the national call. Different from baseball as a Japanese colonial project, basketball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ese by the Chinese immigrant after 1945.

Since 1950’s, Taiwan women basketball achieved great performance in Asia. Women’s basketball became “national business” for the government (*Television Weekly*, 306: 4, August 19, 1968). The Oriental Women’s Basketball Team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emale basketball in Taiwan history since 1965. In 1972, the whole team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for 87 days and achieved 39 winnings in 47 games. March 30, 1972, when the team arrived the airport, they were welcomed by the orchestra of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delegates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CYACNSC. The *United Daily News*’s editorial of the day was titled as “the Oriental Women’s Basketball Team: the successful model:

The Oriental Women’s Basketball Team was carried the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y were encouraged by the national glory and the expectation of our people. Being brave, fearless and strong, they were the role model of us, men and women. They represented the spirit of our destination of national revival. We are proud of ther. (*United Daily News*, March 30, 1972)

According to the texts, elite female athletes seemed no more “others” in the sport field of Taiwan because of the strong articulation of sport and nationalism. Women, as elite athletes, could be the national role model of their people, both men and women. As described in the same editorial, “these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were as great a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players” and “they all diplomatic fighters”. In 1972, *Television Weekly* pressed an article titled as “the tour of the Oriental Women’s Basketball Team”. In this article, these successful female players were described as an open and civilised symbol:

The tour was meaningful, first, these basketball players were not only diplomatic ambassadors; second, they were trained for the 4th FIBA Asia Championship for Women. Besides, they changed the stereotype of Chinese women as conservative and weak. (Pei, 1972: 20)

Zhu-ru Sheng, senior sports journalists of TTV, who traveled with the team many times, described the vigorousness of female basketball in Taiwan in his autobiography:

Women basketball and little league baseball were most important sports games then. At that time people used to say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 was dependent on young kids and women”.(Sheng, 1995: 156)

Despite the success on the sport field, these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were still trapped in the traditional gender expectation. They were represented by famous sports journalist as “girls who loved taking pictures” (Fu, 1972: 40). Despite the praise of “national hero”, they had to sing and dance in TTV sports shows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heongsam (*Television Weekly*, April 17, 1972, 497: 30).

Cheng Chi : the most patriotic female athletes in Taiwan

Cheng Chi (born on March 15, 1944 in Hsinchu, Taiwan) is a Taiwanese track and field athlete. She was an Olympic medalist in 1968, and was named the Associated Press Athlete of the Year for 1970. Undoubtedly, Chi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male athletes in Taiwan’s history. Furthermore, she was described as the sportswoman who always carried a national flag with her (Sports Affairs Council, 2011: 92)

Chi Cheng produced seven world records over 100 yards, 100 meters, 200 meters, 220 yards, 100m hurdles. Within 1964 to 1970, she created a total of 44 Asian records. Chi Cheng's 100 yards record 10.10s set in Portland on 13 June 1970 lasted almost 40 years and only beaten by Veronica Campbell (9.91s) on 31 May 2010. She also won 77 gold medal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o celebrate the Republic of China Centennial, the Sports Affairs Council of Taiwan published books of “the oral-history of elite athletes” covered the life stories of 12 most important athletes in the history, Chi was the only female.

She was born in the last year of Japanese colony; at first, she was named as Japanese by her family. After the 1945, her father changed her name into “Cheng Chi”, a Chinese name. In the 1949, her father was taken as a political criminal by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and prisoned in jail for many years (Sports Affairs Council, 2011). Chi Cheng shared the same life experience as many other women at

that time.

In April 25, 2013, I interviewed Chi Cheng. As an athlete, she mentio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apanese colony and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Japanese admired Bushido. They respected athletes. However, Chiang's government brought "Chinese culture" to Taiwan. They believed the idea that 'everything is low-class work except academic study' (*Wan ban jie xia pin wei you du shu gao*)

When she was a high school student, once her teacher praised her academic performance was "too good to study sports". Chi said, it's a humiliation for her. Today, she devotes in sport promotion in Taiwan.

She believes and claims that "sport makes you smatter"

She told me that

She recommends a book named of "Spark: The Revolutionary New Science of Exercise and the Brain" to everyone, even the currently president of Taiwan.

According to her experience, we can found out that, despite the national importance, being an athlete was still a "second choice" for most Taiwanese.

In 1963, Chi Cheng left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government funding. American Vincent Reel became her coach. Chi Cheng participated in her second Olympics in 1964 at Tokyo. However, she didn't win any medal. She was worried that her funding would be revoked and she would be forced to go back to Taiwan. Thus, she "fled" back to America after the Olympics. Her escape was condemned by most Taiwanese (Sports Affairs Council, 2011: 69). She also mentioned in her oral-history that the Chiang's government asked athletes to "monitor" each other from any political rebellion (Sports Affairs Council, 2011: 66).

Chi Cheng retired hurt in the 1966 Asian Games in Bangkok after she won the gold medal in the 100 meters. This decision provoked Taiwanese. They were asked to "explain" to media and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 A United Daily News article describ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aiwanese journalists and Vincent Reel in Bangkok:

Reel waved a block and his bag to the reporters, he was cursing "no photo, fuck off". Su Yu Zhen, a journalist of Central Daily News, yielded

back “I want to take a picture of her. She is a Chinese. She is our people”.
(施克敏，聯合報，1966年12月14日，7版)

This coverage just expressed how heavy the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was for Taiwanese athletes at that time. For most Taiwanese, Chi Cheng was “our people”; Reel was a “foreign coach”. His professional opinion was subordinate to national request. This kind of conflict peaked when Chi Cheng decided to marry Reel.

In the 1968 Summer Olympics, Chi Cheng won the bronze medal in the women's 80-meter hurdles,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female medal winner in the Olympics. In the December of 1968, in front of the statue of Dr. Sun Yet-sen (the father of the nation) and the national flag, Chi Cheng announced to become a member of Koumintang, the ruling party at that time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1968). Furthermore, she was received by Chiang and his wife

Since 1968, Chi Cheng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model of “patriotic athletes” of the nation. Her most successful year was in 1970. She set five World outdoor records, at 100 meters (11.0s), 200 meters (22.4s), 100m low hurdles (12.8s), 100 yards (10.0s) and 220 yards (22.6s). She also won 66 medals at outdoor events and 21 at indoor events. During the 1969-1970, out of 154 events (sprints, hurdles, long jump, relays) entered, she only lost once. Her stunning performances brought her many honours in 1971. She has been named "Athlete of the Year" by the Track and Field World and at the same time voted as "Global Athlete of the Year"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In 2000, Chi Ching was voted "Female Asian Athlet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the Asian Athletics Association as well as described by the IAAF as "Asia's Legendary Female Sprinter".

However, in 1970, the most controversial news of Chi Cheng for Taiwanese was that she announced to marry her American coach Vincent Reel (Sheng, 1971). Most Taiwanese could not bear that “our” patriotic female athlete to marry a “foreigner” (Ding, 1995). A commentary of *United Daily News* even titled as “come back to get married”:

We believed, people who heard the news that Chi Cheng is going to marry Reel must feel sorry, disappointment, pity and sorrowful. We can't tell how much they love each other. But, sometimes it's better for a woman to marry someone love you more than you love him. Chi Cheng is going to marry someone beneath her; we should send her our blessing. However, they have

to get marry here, the Taipei city or the hometown of her.

The commentary was not only question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ir relation but also strongly expressed the national dominance disciplined the elite female athletes. They were taken as “the daughter of nation”; they should marry to our “own people” not some foreign coach. On December 13, 1970, Chi Cheng announced a “promise” to Taiwanese that she was “proud to be a Chinese” and “would not naturalized to be an American citizen in her life time” (*United Daily News*, December 13, 1970). Furthermore, she would asked her husband to be a naturalized Chinese in the future (*United Daily News*, December 29, 1970).

Looking back to the past, Chi Cheng expressed her opinion on the national discipline in an interview last year. I asked her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nation” to her during her sport career during the martial law era:

She said:

Honestly speaking, we were successfully brainwashed at that time. The countr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us, even beyond our own family. We stood at attention when we heard the name of Dr. Sun Yet-sen or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pril 25, 2013, Taipei)

Furthermore, she still remembered the first time when she received by Chiang and his wife:

He had a dignified way of walking. He was God to me. The first time I saw him, I was a high school student. That was a late, winter afternoon. I remembered his down hat, the cape and the cane. He was so unreal; he was an Immortal to me at that time. HAHAHA. We were so young and so naïve. I used to believe that he was the savior of the human world. I was born as Japanese; than governed by Chiang’s Koumingtang; than the DD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nd the Koumingtang becomes the ruling party again. (April 25, 2013, Taipei)

The best thing ever happened to me was that I could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I understood what democracy is there. The first time I read the *Time* magazine, I was shocked by the ironic represent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If we did that in Taiwan then, we would be arrest and sent into prison. (April 25, 2013, Taipei)

According to Chi Cheng's story, we can find out that as an elite athlete at that time, she was highly disciplined by the nationalism in sports field and her personal life. However, in the same time, she was empowered by the same disciplined nationalism. She got the chance to study abroad and it was important for her national reflection. It helped her to realize the ideology and power disciplined her.

Chi Cheng was appointed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rack and Field Association in 1977. Subsequently, she was Chairman until 1993 and Board Member from 1998 to 1999. Chi won three terms as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serving from 1980 to 1989. Meanwhile,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m replaced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gradually after the end of martial law. In 2000, the DDP became the ruling party of Taiwan. Chi Cheng was awarded the Order of Brilliant Star with Grand Cordon by the government. In 2009, She was appointed a National Policy Advisor by KMT President Ma Ying-jeouin.

Even today, Chi Cheng is still an important patriotic icon for Taiwanese.

Jing-Min (Chi Cheng and Vincent Reel's daughter) plans to have a kid next year. She will ask her child to learn Chinese and Taiwanese. She will never forget the "root" of her. (Cai, 2011)

Conclusion

Finally, the marginal position of nationalism and sport of Taiwan during the Martial Law era created the chance of empowerment for female athletes. They can be 'national heroes',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narratives not simply as wives, mothers or daughters but also as soldiers, warriors and fighters, and can even gain political influence as Chi Cheng did after her retirement from track and field.

As we mentioned above, nationalism is the undertone of the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of sport in Taiwan (even for today). It's hard to capture the concept of sport in Taiwan withou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m and vice versa. And this significant character of Taiwanese sport nationalism creates empowerment opportunities for female athletes. The history of Taiwan sport nationalism will be incomplete without the story of female athletes.

Chi Cheng's life experiences reflect the challenge and expectation of sportswomen at that time. They were disciplined by the nationalism and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ideology. But they also got the chance to resist and reflect over the dominant gender power relations and disciplined nationalism.

Reference

- Bairner, A. (2012).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9:102-117.
- Benton, S. (1998). Founding fathers and earth mothers: women's place at the 'birth' of nations. In N. Charles & H. Hintjens (Eds.), *Gender,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pp. 27-45). London, UK: Routledge.
- Cai, Z. C. (February 14, 2011). Chi Cheng's daughter come back to Taiwan to study Chinese and Taiwanese. Cited from The Liberty Times Net: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feb/14/today-life4.htm>
- Chang, M. Y. (2009).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Taipei, Taiwan: Wu Nan Press
- Chen, Y. Z. (1997).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aiwan. Dan, Y. (). The fifteen letters to Wen Qi. Taipei: Renjian Press.
- Chen, T. H. (2012) From the "Taiwan Yankees" to the New York Yankees: The Global Narratives of Baseball.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9, 546 – 558
- Chen, T. H. (2007) The nationalistic pastime: Taiwanese identities via baseball. *Cultural Study Monthly*, 68, retrieved from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68/journal_park681.htm.
- Chen, T. H. (2012). Towar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sport / 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 *Physical Education Journal*. 45(4): 267-278.
- Chiang, Y. (2013). Multiple margins: gender,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 Chiang, Y. (2014a). The Other of Inheritances: the collective anxiety of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Taiwan society.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 Chiang, Y. (2014b). Not a stepchild to feminism: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sociology of sport. *Sports and Exercise Research*.
-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December 9, 1968). Yan Chuan-kung and Chi Cheng announced to join Koumintang. Cited from: http://nrch.cca.gov.tw/ccahome/search/search_meta.jsp?xml_id=0005920906
- Ding, X. W. (March 14, 1998). Chi Cheng sued against her cheating husband. *The Chinatimes*. Cited from: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olympic2000/effort/proud/about8.htm>
- Enloe, C.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 politics*. London, UK: Pandora Press.
- Fu, D. R. (1972). The note of the America tour II: Olive and coffee. *Television Weekly*, 491: 40-41.
- Guang-xing Chen (2006). *Deimperialism: taking an Asian methodologically turn*. Taipei: Editions du Flaneur.
- Hall, M. A. (1985). Knowledge and gender: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in the social analysis of sport.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 25-42.
- Hargreaves, J. (1990). Gender on the sports agenda. In E. Dunning & Malcolm, D. (Eds.), *Sport: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ume 1* (pp. 324-346). London, UK: Routledge.
- Hwang, J. L. (2010). The civil right and the civil body. In Huang, J. L., Wang, H. L. and Huang, C. X. (eds). *The Margin of Empire*. Taipei, Taiwan: Socio Publishing, 251-281.
- Huysen, A. (2003).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plan, J. (1979). *Women and sports*. New York, NY: Viking Press.
- Li, Y. X. (1976).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Sports Federation
- Liu, Z. Y. (2007). Taiwan: wome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1895~2006).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 Maguire, J., Jarvie, G., Mansfield, L. and Bradley, J. (2002)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ILL: Human Kinetics.
- Messner, M. A. (1988). Sports and male domination: the female athletes as contested ideological terrain.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5, p. 197-211.
- Morris, A. D. (2011) *Colonial project, National Game: A history of baseball in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i, H. (January 1, 1972). The tour of the Oriental Women's Basketball Team. *Television Weekly*, 484: 20.
- Pronger, B. (1990) *The Arena of Masculinity - Sports, Homosexuality, and the Meaning of Sex*.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ports Affairs Council (2011). *The oral-history of elite athletes: Chi Cheng*. Taipei, Taiwan: Sports Affairs Council.
- Sheng, Z. R. (January 4, 1971). Coming back from the Asian Games. *Television Weekly*, 430: 8-9.
- Su, K. H. (2004). Social Produc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Invisible Colleges among Sociologists in Taiwan. *Taiwanese Sociology*, Number 8 (December 2004): 133-192.
- Su, S. B. (2011) Leisure, Sport and Tourism. In Zhang, Y. H. (ed). *The history of*

- Republic of China (II). Taipei,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621-653.
- Taiwan Women's Writing Association (1965). Taiwanese women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aipei, Taiwan: Taiwan Women's Writing Association.
- Tang, Z. J. (2009).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of socialcultural history. In C. X. Zou & F. S. Su (Ed.), *The reflection and insigh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studies*. pp: 313-366. Nanhua University
- Television Weekly (December 3rd, 1962). The Schedule of Sport Shoes. *Television Weekly*, 8: 30.
- Television Weekly (December 31, 1962). Baseball: Waseda VS Keio. *Television Weekly*, 12: 6.
- Television Weekly (May 13, 1963). Golden age: the Swan ice-skating team. *Television Weekly*, 31: 14.
- Television Weekly (July 8, 1963). Skill sports. *Television Weekly*, 39: 42.
- Television Weekly (October 18, 1965). Today sports: motorcycling. *Television Weekly*, 158: 29.
- Television Weekly (November 22, 1965). Today sports: women football. *Television Weekly*, 163: 47.
- Television Weekly (August 19, 1968). FIBA Asia Championship for Women . *Television Weekly*, 306: 4-10.
- Television Weekly (April 17, 1972). The sidelights of TTV. *Television Weekly*, 497: 30.
- United Daily News (March 30, 1972). Editorial: the Oriental Women's Basketball Team: the successful model. *United Daily News*: 2.
- United Daily News* (December 14, 1970). Come back to get married. *United Daily News*: 6.
- Yang, G. S. & Wen, C. Y. (Ed.), (1982).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studies*.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Ye, Q. Z. (2003). Game of power/knowledge in Taiwan sociology. *The NCCU Journal of Sociology*, 25: 1-34.
- You, J. M. (2011). Be ourselves: Wome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Zhang, Y. H. (ed). *The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I). Taipei,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75-307.

攜回資料以及佐證資料 (照片)



- health when the style and content of the approach used is acceptable for them.
- 10.20 ***The game of (your) life: Professional rugby careers***
Christine Coupland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This study uses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areer considerations of professional rugby players. Taking the perspective that a professional sport's person regards their sport-craft more like work and less like leisure it is timely to consider how this; embodied, temporally short, publically performance-measured, ultimately degenerative, career is given credibility by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it at an elite level. How this is achieved may be explained by drawing upon Bourdieu's key concepts and applying them to the empirical material collected during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members of one, UK based rugby league team who at the time of the study played at the super league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in the UK).
The analysis illuminates the rugby players' collaborative practices in not considering a career beyond the playing career. Nevertheless, the rules of 'play' hav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participants as their focus on producing the appropriately crafted, embodied, performance does not incline them to look at, or question, the mater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f their lives and the end of their playing career is rarely given serious consider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club is located, where former heavy industry has declined, this, albeit temporary, sojourn into a physically hard, body damaging, but undisputedly masculine environment appears to bring sufficient reward, the logics of which make sense to the members who retain an overriding desire to remain within the industry that celebrates their physical literacy.
- 10.40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Taiwanese female athletes under martial law***
Ying Chiang (Chihle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the arguments of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Western culture, women were mostly seen as a figure trapped in a marginalized position vis-à-vis men. However, as a product of modernity, modern sport was, bearde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ulture. It is important for non-western researchers to contrast their localized and gendered discourses on the same issue with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Recently,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scholars



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5/10/10

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女遊史: 臺灣女人的旅行再現、實踐與認同 (1980-2000)
	計畫主持人: 姜穎
	計畫編號: 103-2410-H-263-006- 學門領域: 運動社會學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姜穎		計畫編號：103-2410-H-263-006-					
計畫名稱：女遊史：臺灣女人的旅行再現、實踐與認同（1980-2000）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 ：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1	100%	篇	預計投稿 TSSCI 期刊「大專體育」，已經完成初稿。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1	1	100%	人次	碩士生兼任研究助理1人次，大專生兼任研究助理2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於英文 2014QRSE 研討會完成口頭發表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Taiwanese female athletes Under Martial Law" 一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0%		
		研討會論文	1	1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 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 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 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 字敘述填列。)	本研究在撰寫過程中，研究者亦完成了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刊物《臺北體育》第21期(2015年8月出版)中之專題報導「從體育促進妳/你我的性別友善城市」五千字專文，論述運動、休閒在城市中的性別意義。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一、學術成就與學術價值部分

整體而言，本研究乃是企圖超越透過官方統計數字僅能提供量化的臺灣女人的旅遊經驗變遷趨勢的局限，建立一個質性典範的論述，描述「女人的旅行，旅行的女人」在臺灣社會的1980、1990（這兩個階段是臺灣海外旅遊初興、卻甚少被言說、記錄的年代）年代的詮釋與實踐內涵。學術成就方面，本研究在既有休閒研究論述中是少數歷時性的研究，大量整理了1980與1990年代的平面媒體（報紙）並透過電視週刊的紀錄，再現出當時的電子媒體文本，在文獻的蒐集上更為擴展。勾勒出1980年代前後臺灣社會特殊氛圍之下的女性旅遊再現與實踐以及1990年代社會風氣劇烈轉型下的變遷。其次，本研究亦採取批判式的論述分析，在析論1980、1990兩個十年的臺灣女性（海外）旅遊媒體再現以及女旅人實踐的過程中，透過批判式、（休閒）社會學的立場，將蘊含在其中的性別與國族主義等意識形態力量勾勒出來，在批判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其三，研究方便層面，本文在研究不同階段彈性使用多種研究方法，非純然的文本、論述分析，本研究不僅聚焦媒體再現過程中刻畫的「集體記憶」以及權力關係，亦透過（重要）女旅人的深度訪談，將1980、1990年代重要女性旅人的旅遊實踐、詮釋與認同紀錄下來，透過與文本的辯證，在結構與能動間進行多元的想像。整體而言，學術成就方面，本研究對於開創運動休閒場域的性別論述具有一定程度的學術價值，亦是開啟性別的、批判的運動休閒社會學在地（臺灣）論述的起步性研究。因此，本研究計畫將完成之研究成果投稿至國內

運動休閒期刊（如大專體育，tssci期刊以及社會學期刊（如臺灣社會學刊，tssci期刊），已深化運動（休閒）社會學與主流社會學界對話的能動性。

二、社會影響（兼論本研究之學術與應用價值）部分

基於主流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典範以及產學合作的主流期待與分工模式，本研究為少見的運動休閒社會學立場批判論述，將提供產業界、社會實際應用層面在改善與促進運動休閒（旅遊）性別平等意義。本研究在撰寫過程中，研究者亦完成了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刊物《臺北體育》第21期（2015年8月出版）中之專題報導「從體育促進妳/你我的性別友善城市」五千字專文，論述運動、休閒在城市中的性別意義。研究者亦規劃將研究成果投稿國內觀光休閒期刊，期望能提供運動、休閒社會學批判、性別立場的論述，提供相關產業性別平等企業管理、商品與服務的發想與日常實踐。